

郵政管理局登記證
警字第一四六五號
登記執照號碼第一三三四號
類新聞紙

第四卷 第十二期

問題與研究

本期要目

中墨關係暨墨西哥政情.....	何鳳山
德國對現代中國問題之研究.....	杜勉博士
星加坡獨立及其今後動向.....	吳春熙
希臘政潮之分析.....	孫德湘
日本與東南亞經濟開發.....	張棟材
各國戰時糧食動員制度的研究(上).....	何舉帆
論布里茲涅夫的農業政策.....	呂律
蘇俄控制下的外蒙.....	王啓升
茅盾夏衍垮台的前因後果.....	王蘊
共匪糧食生產的可靠性.....	楊允瑛譯

國際關係研究所印行

中華民國五十四年
九月十日出版

目 次

中墨關係暨墨西哥政情	何鳳山	(1)
德國對現代中國問題之研究	杜勉博士	(7)
星加坡獨立及其今後動向	吳春熙	(9)
希臘政潮之分析	孫德湘	(14)
日本與東南亞經濟開發	張棟材	(19)
各國戰時糧食動員制度的研究(上)	何舉帆	(23)
論布里茲涅夫的農業政策	呂律	(32)
蘇俄控制下的外蒙	王啓升	(37)
茅盾夏衍垮台的前因後果	王蘊	(42)
共匪糧食生產的可靠性	楊允瑛譯	(48)
拉丁美洲的地理人文與現勢	劉樹遠	(53)
西德大選與歐局 (西德通訊)	風息	(57)
佛朗斯瓦·龐塞論戴高樂 (法國通訊)	王人傑	(58)
蘇俄動態述評		(60)
①上半年經濟計劃執行結果		
②更換宣傳部長加強政治教育		
③對非洲之活動		
④俄阿條約展期十年		
⑤土耳其應邀訪俄國		
每月大事記(國際·敵情)		(62)
編後記	編者	

附：本刊第四卷索引

中墨關係暨墨西哥政情

何鳳山

按本文係我前駐墨西哥大使何鳳山博士於本年八月二十七日出席中華民國國際關係研究所學術講演會所作之專題報告，特刊出以饗讀者——

主席，各位先生：今天能有機會與各位見面，並且報告我在墨西哥七年的經過，覺得非常的愉快和榮幸。

墨國在拉丁美洲的許多國家之間，堪稱是最重要國家之一，就地理的位置而言，與美國為近鄰，擁有一千七百餘公里長的界線，有一百九十七萬三千餘平方公里的領土，人口號稱四千萬，它在拉丁美洲的國家中可以說是一個大國。該國的人口在拉丁美洲的二十個國家中佔第二位，版圖佔第三位。特別令人注意之處，即該國在最近三十年間，政治非常穩定，決無像其他國家不時掀起革命或政變等情事，在拉丁美洲國家中可以說是難能可貴的事蹟。因為有了三十多年的政治穩定，所以無論墨國再有多少的缺點，它在經濟方面竟能保持廣續不斷的繁榮，這也是墨國在拉丁美洲國家之間表現出偉大的一點。

墨國最近幾年來的經濟成長率，平均為每年增長五·七，特別是近兩年來已達到七·六，據最近聯合國調查統計所顯示，已經達到百分之十，因此，就該國平均每年經濟成長率而視，允稱是世界上百分數最高的國家之一。墨國的首都，是以現代化而馳名於世界，不但有現代的建築，而且市容美觀，宛若置身於一大公園之中，因此，墨國人民常引此自豪。墨京現有人口六百萬，像這樣一個龐大的城市，而且不為世人所盡熟悉，也就難怪連美國人到了墨京之後亦無不驚奇。

墨國的經濟成長既然是如此的迅速，當然靠牠的資源作基礎，

中墨關係暨墨西哥政情

如農業有棉花、糖、鑛產如銀五金以及汽油等，不過牠的主要收入何在呢？說來也許各位感覺懷疑，其實，墨國是和我們現在台灣所倡導的發展觀光專業業同出一轍，祇是在時間上比我們早而已。單以去年該國在觀光專業方面的總收入而言，便已達到七億美元。而今年該國所希望者，是要達到十億美元。綜觀上項數字誠不能不令人驚異。除此之外，墨國與美國的經濟關係非常密切，輸出入幾佔百分之八十，所以就墨美兩國的經濟關係來說，確是密切不可分離。

一般人對墨國的觀感也許稍有偏差，以為即算在三十年來的政治穩定過程中，達到了今日經濟繁榮的業績，而在文化的疆域中不過乃一時的「暴發戶」而已，墨人在此一點上非常下工夫。據他們自己說，墨國的文化非常古老，而且他們認為墨國的人種是遠在三萬年以前，由亞洲沿北部白令海峽（當時沒有海峽陸地相連）到達美洲南移的，也就是說印第安人種乃是從亞洲而到美洲，而至於墨西哥的，他們說墨國的歷史，可追溯到紀元前一千三百多年。

有許多的墨西哥的共產黨，前往中國大陸匪區訪問時，毛匪澤東與周恩來都會異口同聲的恭維墨共，說墨國的歷史實在比中國還古老。這當然是胡說八道。不過，我們由這一點也可以看出來，共匪是如何肯利用別人的弱點獻媚，因墨國的人民經常稱讚我們中國的文化非常古老，所以共匪也就利用他們這種崇拜的弱點，反而恭維他們更古老。以上我報告的是墨國的一般情況，下面我將講述墨國的政治思想上的一些歷史背景。

墨國一般的政治思想，而反映於內政與外交上的，由下面的幾個口號便可以概見一斑。就內政方面來說，現在墨國的執政黨平常稱爲PRI（即革命憲政黨的縮寫），該黨自執政以來，迄目前止業已當政三十五年之久，在這三十五年中，從未間斷的由該黨主持國是。除該黨之外，其他雖然也有小黨，但是均屬微不足道。革命憲政黨的口號是「自由、民主、社會公平」，此與我們中



· 何鳳山博士 ·

們的「民權」，「社會公平」就是「民生」。這三個口號，是順沿該國的歷史演變而產生的。也可見十九世紀墨國所遭遇的與我們所受的痛苦大致相同。在對外政策方面有兩句話：第一是不干涉別國的內政，第二是民族自決。對外政策的兩個口號，當然也是從歷史的演變而產生的。所以墨西哥政府常常的自稱牠的外交政策，是真正的獨立外交政策。當然也有人指責墨國在外交上時有袒護蘇俄

於我
一民
等主
「民
族」
的民
於我
等
由「
自
黨的
該
義相
民主
的三
民黨
國國

的跡象，甚至在多少方面也有學蘇俄的地方，這一點墨國非常的駁斥，強調墨國的一切係歷史的產物，與蘇俄風馬牛不相及。假若說蘇俄的革命是在一九一七年時，那麼墨國的革命則在一九一〇年，比蘇俄早了七年，證實與蘇俄確實毫無關連。

就墨國的歷史沿革而言，很可以舉出幾個爲何產生獨立外交政策的實例，供各位的參考。首先我們知道墨西哥是一個反殖民主義的國家。早在一五一九年由赫爾門·高戴斯率領軍隊，從古巴出發征服墨西哥之後，當時是受西班牙的統治近三百年。到了一八一〇年時，有一位叫米格伊達高的神父起來領導革命，原因就是受不了西班牙人的壓迫，他們挺身而起，反抗殖民主義和封建主義。一八二一年墨國乃完全獨立了！所以墨國的後代視伊達高先生爲國父，備受推崇。在每年九月十五日慶祝時，墨國總統當着民衆仍然大聲疾呼的喊這「國父」的革命口號。

由於上述關係可以看出墨西哥是在歷史上獲有此種教訓，所以他們是堅決反對殖民主義，這是墨國自古以來一直反抗殖民主義，而演變成今天的對外政策。墨國由一八四六年經過墨美戰爭，及自一八五七年起至一八七二年的改革運動時期，經十五年之久的鬥爭，正值歐洲各國的帝國主義蜂起，氣焰高漲，同時加上了與國內的惡勢力的鬥爭，真所謂內憂外患，不可終日，是一段非常渾亂的局面。墨美戰爭距今雖然已一百多年，但是墨西哥人迄今猶未忘懷，形成了墨人堅強的「反侵略與反帝國主義」。祇要我們留心而且一進入墨國的博物館時，就會一眼看到迎面擺着一幅大的地圖，這就是顯示墨國原來有一大半的土地，現在是割讓給美國。因爲經過這一場戰爭的結果，像現在美國的德州，新墨西哥州和加里福尼亞州等地，都是從墨西哥割讓到美國去的。本來事情至今已逾百年之久，實在不應該成爲再談論的問題，而墨人迄今念念不忘，竟有希望有一日能够收回失地的。

墨美戰爭發生於一八四六至一八四八年，美國的軍隊曾經直趨墨京，圍攻巧配迭卑克堡壘。這一個堡壘是防禦墨京最後的一關，堡壘的守軍已彈盡援絕全部犧牲，祇剩下了六名青年軍官，他們知道不可再守時，於是各用兩旗裹身，從堡壘上跳下去成仁殉國。所

以迄今爲止，每年國慶之前一天，九月十四日，單獨舉行一項儀式，紀念六位成仁的青年烈士，象徵爲現代青年學生愛國的楷模，有如我們青年節的意義。這種紀念儀式異常隆重，墨總統與政府大員以及外交使節青年軍官學生全部參加，除鳴鎗致敬外並由軍官學校隊長依次高呼這六位爲國犧牲青年的姓名，每喊出一個的姓名時，台下所有人員則齊聲高呼「萬歲」！於此可以見出國家與國家間的思想，固然由於時間歲月的演變可能充淡，但是其中所遺下的痕跡卻不會輕易消逝。

在當時墨西哥尚遭受了法國的侵略。法國在一八六二年向墨西哥討還賠款未遂，鑑於墨國擁有豐富的銀礦，於是便聯合英國和西班牙進兵墨國，最先是藉口討債，繼而英西兩國窺破其目的并非爲此，乃自動退出。法國於是單獨行動於一九六三年佔領全墨。以後還找到奧國的一個大公爵麥克斯密倫來墨國做皇帝。本來墨國是有總統的，是一個印的安人名叫華賴士，但是法國佔據後就唆使一些保守派的人物，往歐洲請願，假借民意，造成這一幕滑稽的悲劇，因爲這位大公爵是奧皇的弟弟，他到墨國做了五年皇帝後，美國的南北戰爭已告結果，大勢已去，便被墨國總統逮捕鎗斃。以上兩件歷史的教訓，在墨國人民的腦海裏最難忘記的事情。不過法國侵略雖然搗亂多年，而因未佔領土地，所以情節比較輕點。

前年法國的總統戴高樂，曾經運用一切手段拉攏墨西哥和拉丁美洲各國。他第一件事是將存在法國博物館內，前述墨法戰爭時所搶掠的兩面墨西哥國旗，送還給墨國，以期收買墨國人心。結果居然奏效，因墨西哥竟認爲法國此一表現非常友好，是以當戴高樂訪墨時，墨國朝野上下曾給他盛大的歡迎。

除上面所報告的墨國史例之外，另外尚有兩點令人矚目的事情：我們都知道現在拉丁美洲各國幾乎全部承認西班牙的佛朗哥政府，但是，迄今爲止唯有墨西哥是不承認西班牙的佛朗哥政府。墨國所承認的仍然是以前的西班牙共和國，西班牙共和國也仍然在墨京設有大使館。並且就編制人數而言，除美蘇兩國外，這一大使館在外交名單上佔第三位，這是一樁令人感覺奇異的事情。

墨國與現在的佛朗哥政府，祇不過是一個商務的關係而已。佛

中墨關係暨墨西哥政情

朗哥政府派駐在墨國的商務代表人，早在五年前就想盡方法企圖和墨國建交，有一次他發出一份請帖給各國使節，請帖上印的是佛朗哥政府派駐墨國的代表等字樣。當時我與其他駐墨的外交團多數都被邀請，但是墨國政府獲悉此一消息後會駁斥的說「他沒有外交代表的資格」，且指責他亂發請帖，認爲「失態」，以後佛朗哥政府祇好調回該代表另派新人接替。

墨國所以不承認西班牙佛朗哥政府的原因，一則乃西班牙共和國流亡人士在墨的勢力龐大，與左傾沉同一氣，不斷的作怪，他則據墨國人的解釋說：他們以爲佛朗哥政府的立國精神，根本上是和墨國的外交政策相反的關係。因爲墨國主張不干涉他國的內政和民族自決的。西班牙共和國和國的產生是由人民投票選出來的，佛朗哥政權則是藉外力，亦即由德國和義大利干涉幫忙硬打出來的。像德義兩國的干與便是外力，所以不予承認等語。

另外一件事是凡由梵蒂岡教廷所派駐拉丁美洲各國的大使或公使，都是首席外交的代表。唯有墨西哥例外，它是在八年以前才允許梵蒂岡教廷派駐一個宗教代表，而并非外交代表，墨西哥政教分離，根本不承認梵蒂岡的宗教代表外交的地位與權利。所以外交團的名單上是無名的。追究此事的遠因就要說到當一八五七至一八七二年時，正是墨西哥內政最渾亂的一段時期，前面已經說過，在墨國人民心目中在此一段改革時期內，當時總統法賴士主要工作，是打倒宗教控制政治的力量，而達到所謂政教分離的局面，並且很多的大地主都與教會有關。法賴士爲了剷除這個力量，且不惜公開與羅馬教廷破裂，宣佈斷交。今雖專過境還，而墨西哥仍然有所戒懼，祇承認其宗教的地位。

法賴士實際上并非西班牙血統的墨西哥人，而乃是一個黃種的印地安人，後來當了墨國的總統，由於他的智慧與毅力，得到革新的成就，所以後來墨人譽之爲墨西哥的林肯。他在政治上的最大成功，是將政治與宗教完全分離，將宗教的力量從政治中擡出去，使它不再干涉困擾。而且許多大地主和天主教的財產全部都被充公，一直到現在爲止，仍然不准天主教在墨西哥私置財產，所以天主教在墨國的經費維持和財產來源，完全是靠信徒捐贈，決不准自置私

置。這是墨國歷史上的特殊情形，因而產生今日不同的後果。

美國與墨國的外交關係，由於在歷史的演變上兩國曾發生過不愉快的事例，所以迄今兩國之間仍難免不無隔閡。最令人奇怪的一件事，也是我在未赴墨國前所感覺到的，認為墨美兩國既為鄰邦，英語使用必在墨國極為普遍。那知當我到達墨國之後非常失望。當我第一天進駐大使館後始知道，館內的雇員與佣人都不會說英語，甚至於要杯水喝也得打手勢，因此加深了我必需自翌日起學西班牙文的決心。

墨國的大學生近年來日益增加，照理應當是會講英文的，但事實上不盡如此，他們離美國雖近，而以往卻不一定要留美，他們反而遠道投奔法國。特別是學藝術的對法國更有濃厚的興趣，他們畫的油畫，多係大氣蓬勃的壁畫，像著名的畫家伊達高維拉、阿萊斯克等頗有名氣的人，卻沒有一個不是共產黨。

原來祇要你想打進藝術的圈子，做個畫家的話，你最低限度也要左傾，假若你連「左傾」都不假裝，那就恐怕沒得飯吃了，我會經派了一位秘書隨同農業代表團，到墨國的鄉間去參觀遊覽，就發現各小學校裏的讀本中，內容幾乎都是直接或間接對美國不利的。我們過去也曾經邀請墨國的糖業專家來台參觀，他們看過之後，對我們各種的進步可以說是非常的佩服，回到墨國不但是到處演講而且還出版書刊加以介紹，但是這種書却祇印些單行本，而不能大量的印發。為什麼呢？據某政要的代表稱：該國實行土地改革已達五六十年之久，而且認為乃拉丁美洲國家的模範，自視甚高的墨西哥政府與人民自不願棄其所學而學之。所以我們的農業改革，在他國可以風行，而在墨西哥則未得到任何的重視。何況年前的農業部長是一個著名的左傾份子，甚至說他是一個共產黨徒。

美國人幫助墨西哥發展農業，頗賣力氣。洛克菲勒基金每年不知出了多少錢，但是普通一般人卻不曉得。譬如說：有一次我在某宴會中，談到當時甚為流行的早餐運動，這是說給全墨貧苦兒童以免費的早餐，天天報紙上宣傳的，是墨總統夫人如何的倡導，亦即時時歌頌她的努力，彷彿這一筆大款，不是她就無法籌辦似的，然而實際上，你知道這筆錢的百分之八十，是出在誰的身上？還不是

美國人掏腰包捐贈的。何以墨國的報紙隻字不提美國。恐怕仍然是「民族自尊心」在那裏作怪！這不過是一個小例，其實美國所幫的大忙還多的很呢。所以從這一點也可以看出墨美兩國的微妙關係，墨國認為你美國送點錢給我是可以的，但是要我感到激涕零的表示那卻辦不到。

各位也許還記得，墨國的前任左傾總統，羅勃斯，就曾故意與美國公開的開過玩笑，他說，我們墨西哥的政府乃是一個「極左」的政府。這句話說出之後，馬上美國全國嘩然，引起軒然大波。美國人認為假若他們的投資事業，遭遇到像一九三八年一樣的被充公沒收，那還得了！這位總統知道玩笑開得太大，於是又補充的說：我們墨國政府乃一在憲法範圍之內的極左政府。經此解說之後，美國的緊張情緒纔緩和下來。美國為酬報「善意」的表示起見，幾千萬的美金借款不成問題。理由甚多，如維持貨幣穩定，就是其中之一。

一般看來，墨西哥最易與美國立於相對的地位。自從古巴變色以後，十九個國家中已大都與古巴斷絕外交關係，但是墨西哥卻拒絕斷交，仍舊維持與古巴以前的關係。美國國務院主管拉丁美洲的助理國務卿湯姆士麥恩，不惟不贊成，而且居然公開的表示說：墨國的這種態度，我是深切的同情和瞭解。

像這一次多明尼加事件發生時，墨西哥就是站在反對美國派兵的，他認為美國的舉動就是干涉內政，上面各種事例都證明，墨國的意見不求苟同，有時候是給美國難堪的！但是，這都是些小問題，如果遇到大的問題時，例如和與戰的緊要關頭時，他們就不再貿然唱反調，而是毫無疑義的和美國站在一起的。譬如說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已不必重贅，就拿最近的古巴事件來說：當甘迺迪總統要與黑魯曉夫攤牌時，當時的羅勃斯正在遊歷遠東各國，抵達檀香山後獲悉此一消息時，當即宣佈說：萬一戰爭因此爆發我們決與美國站在一條戰線。由此可知墨國與美國方面雖然在小節上時有糾葛，但是一旦遇到生死大事，他仍然是與美國并肩以赴，至承認古巴與否，認為對美國而言是無關重要的，當然也知道決不會為此而引起戰爭。

美墨兩國的關係，可望一天一天的改善與加強，尤其是在前年，甘迺迪總統未死之前，曾對墨國有極優良的姿態表現。他將美墨邊境的契米薩一地，交還給墨國而使墨國人民大受感動。本來契米薩這個地方是很小的一塊地區，原來是因為河流改道的關係，而變更了地方的主權，契米薩本是靠近墨國，但改河道後為美國所佔有，而且當時就不肯交還墨西哥，這件事情曾經過很長期間的交涉，且提交國際法庭裁判，結果雖判給墨西哥，然美國並未遵行。甘迺迪總統在當年羅斯福總統「善鄰政策」之後，而採取了「進步同盟的政策」，這乃普遍的對拉丁美洲國家而言，至於美墨兩國之間應該是個關係更加密切。所以在前年就將契米薩交還給墨西哥。實際上這個地方根本無甚經濟價值，而且又是彈丸之地，但是，墨西哥人卻因之感到無限的滿意，每當談起這件事時，無不眉飛色舞的引以為榮，認為這是他們精神上得到了一大勝利。

我們希望美國與墨西哥兩國，就暨還契米薩一地為契機，今後能逐漸改善兩國間的關係。因為美墨兩國近在咫尺，而且墨國一天一天的進入現代工業化，在經濟方面依賴美國之處日益加重，觀光事業一項收入每年可達七億美元，今以產銷市場而論，美國近在毗鄰當然就是墨國最理想的市場，其有益於墨國的輸出，不待智者而後知之，捨此而外在別處實在找不到再好的來代替。即以美國本身所需要的工業原料而言，假若是就地取材的話，也沒有另外一個國家可以供給更加便利的。準此以觀我相信既然這兩國在政治的立場已經是如此接近，加之今後在經濟上再密切的聯繫，自然在國際外交上會日趨友好，加強合作。

現任的墨國總統以及朝野人士對以上所云並未忽視，也正在為兩國而做進一步的拉攏工作。墨國的卸任總統米葛·歐理曼，他在十八年前總統任內，為墨國工業化制度鋪路，三年前他來我國訪問後返回墨京，曾竭力宣揚我們蔣總統在台灣的各種進步。他擔任墨國觀光協會理事會的會長，經常奔走於歐美各國之間，其最大的使命，就是國民外交尤在如何使墨美間關係特別密切。歐理曼在墨國政權上乃極重要的角色，他的擔任此職，也是表示墨國確實珍貴美國的友誼。以上報告的是墨西哥的對外政策與關係，下面我將報

告我們中華民國與墨西哥的外交關係。

就中墨兩國關係來說：除小說式的流傳外，華僑早已於一八六四年大批的往墨，惟我與墨國建交則稍遲，亦即在一八九九年十二月十四日（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十二日），始雙方在華盛頓簽訂中墨條約十二款，次年我派代辦李經敘駐節墨京，這是我派往墨京的第一個外交官，邦交建立後慈禧太后特賜中國傢俱壹套，包括繡花屏梓木傢俱與磁器，送給當代墨國的迪亞斯總統。直到現在墨國仍然保存陳列在墨京的歷史博物院中，而且這套東西在該院中是特別引人注目的陳列品。前年該院會要求我國再贈送些中國古式的花紙或地氈等補充配合，但我們迄今未能辦到，因為極不易找得適合的材料。去年于斌大主教訪問墨國參觀該院時，在上述的傢私磁器陳列室內，看到慈禧太后的畫像時，認為經過了這多年的時間，依然保存的很好，頗覺難得，大主教還對我說：他遊歷許多國家却很少見到這樣的一幅畫，特別要我把它拍下照片寄回國內留做紀念。

自中墨兩國建交後，我國曾在墨國訂購許多銀元，也叫鷹洋，「鷹」就是墨國的國徽。墨國國旗上有隻鷹，口中啣着一條蛇，站在一顆仙人掌掌上，關於這些當然是有典故的，不過礙於時間的關係，於茲不再細說。後來我們一直到抗戰時，雖然與墨國之間并無特別顯著的關係表現，但是有一段時期，從一九〇〇年到一九二一年旅墨華僑竟多達四萬餘人，這是華僑的全盛時代。那時墨西哥還沒有移民局，出入國境自由，墨國有二省的商業幾為華僑所獨佔，不僅使墨人嫉妬，而其他國家僑民亦莫不眼紅，因此發生了排華運動。從一九三一年起排華運動掀起後，愈鬧越凶，至於不可收拾，使華僑辛苦經營的事業連根拔掉，受害甚厲。多少人竟被驅逐出境，財產不能帶走，白白的斷送一切，直到前幾年這些人的後裔才獲得返回墨國，後者是本人經手交涉辦理的。

當我在七年前到達墨京時，墨國的態度雖然一貫的堅持獨立政策，不過有許多人都看起，把他們的作風解釋為接近左傾，所以共產黨就蓄意在墨國滲透，匪共幾乎是全力以赴。在我尚未到任之前，匪共已經是多少次藉教育文化的名義，在墨大肆活動，某大使就是犧牲在上述情形之下而離任的。因為當時墨國的共產黨已與匪共

同流合污，舉辦了匪共教育展覽，於是我們某大使就到墨教育部去提出抗議，雙方就鬧得極不愉快。當我到墨西哥時，我就曉得匪共在墨國的滲透活動，勢將藉機更趨積極，所以，我在墨國的七年之間，除正常的外交活動外，確確實實是時時在佈置如何與共產黨爭鬥。現在的外交官不是像各位平日所想像的一般，以為祇是在國外穿着禮服宴請賓客，握手打招呼說說漂亮話而已，據我七年在墨國的活動經驗，最大對象之一，是針對匪共，打擊牠所有的一切陰謀。

在我駐墨國七年間，共產黨的文化政治滲透，最大的有十四次，因時間限制不能全部說明，舉一個例來講，我到任後的第二年（一九五九年），那是共匪的北京劇團七十多人，準備到墨京表演。當時我要往墨國北部去旅行，臨行前墨國外交部長告訴我說，可能不會來了！但是，在旅途中我得了長途電話的報告說，他們不但會來，而且已有五個人先已到達，從事籌備工作。我聽了立刻結束旅行，返回墨京交涉，當時恰巧有一個很好的機會，就是墨共正在滋事生非，而且發現蘇俄使館的秘書與武官作煽動的工作，墨政府把他們驅逐出境，我就藉機提出交涉，結果不祇是所謂北京劇團的七十多匪共取消簽證，即已來的五個匪幹，亦全部由墨國警察看管，於二十四小時內押解出境，這是我們很值得一提的痛快事情。

另外就是我們對匪共的行動，勿論是在何時何處均加以密切的注意，也不管他們來與不來，事先有周密的佈置，對他們的活動全控制在掌握之中。我和共產黨鬥爭認為比較最驚險的一次，就是在前年的下半年起去年的年初，匪共以前都是假藉文化和藝術的名義作進攻滲透的工具，但是後來他們已感覺到這一套已經失效，不能成功了。墨西哥人是很現實的，文化藝術既不能吃又不能喝，不足發生充分的誘惑力量。所以決定實行鐵彈政策，一九六三年正月冀匪朝鼎，率領一個經濟代表團到墨國訪問，由墨國的左傾商人及墨共的事前安排，居然順利的與出入口貿易銀行簽訂了三千萬美元的棉花和小麥的交易，他們提出的唯一條件，就是准許他們演戲與開展覽，在這裏我不必詳述如何阻止的經過，因為所用的方法既複雜也很多，第一，我們得到了墨國政府正式宣言，說明匪共的

來墨作買賣，簡言之是與墨國政府無關，僅屬私人商業的行為。第二，墨政府所有的公共場所，不租給匪共使用，展覽會需要的場地很大，而墨京也祇有一個最大的是國家大禮堂，過去不論任何國到墨京舉行展覽會時，都是借用這個大禮堂，我提出墨國政府既然宣佈匪共一切與政府無關，那嗎就不能租借他們公共場所，結果不但拒絕租借了大禮堂舉行展覽，而且藝術宮也不借給他們作戲劇表演，這對匪共是一致命傷的打擊，因為展覽演戲以後均沒有人看。雖然匪共煞費苦心在一個菜市場傍邊租下一大塊空地竟不惜花費六十萬美元，建築了一座宮殿式的大房子，作為展覽場所，這祇說明他們是下了最大的決心爭取墨國朝野。然而究未能挽救已經失敗的命運。

我們在墨國既無可用之人，亦無可用之錢，我們有的是墨西哥朋友幫忙，我們的智慧與努力合在一起，遂產生了奇蹟，因為有關匪共的一切我們事前都知道，不僅曉得他們演戲、展覽。並且還帶了百多噸的宣傳品，與大批的嗎啡毒品，後者是想法運到美國去的。這些消息經墨京的報紙宣佈後，整個的墨西哥為之震憾，結果內政部派員前經搜查，大部宣傳品充公，毒品雖未找到，而聲名狼藉已不可收拾，展覽場外的五星旗，五星扯掉祇剩下三塊大紅布豎在那裏，而門前冷落無人去參觀。有一位老太婆對他們說：「現在已經是核子時代，你們陳列幾部機器，算不得甚麼，不要以為了不得，至那些地氈盜器藝術品等舊東西，我幾十年前在大陸上早就看過吹特吹的如何成功，真不知人間有羞恥事！」

我們此時反共最有效的，是將大陸共匪奴役人民的照片，在超然報上全頁刊登出來，獲得輿論一致的同聲。他們看見匪共鎗斃婦孺，以及神父挨餓的照片時，會羣起打電話給警察局，要求驅逐謂匪共，這是正義感的表现，值得珍貴，總之，此次匪共的失敗，可說是全軍覆沒，也可以說賠了夫人又折兵，因為他們的政治目的沒有達到半點。如：(一)墨政府向我担保不與匪共發生任何政治關係；(二)不准匪共在墨設立商業代表團。(三)墨國除准匪共現錢買現貨之外，絕不予以信用貸款或其他類似的方式，所以成功的顯

然反而是我們。我們告訴墨國人說：你們真想通商貿易的話，最好

是和我們中華民國加緊關係，我們工業成長的數字額之增加，與出入口可以為證。去年徐柏園總裁往拉丁美洲訪問時，與墨國政府簽訂了中墨商務協定。乃這一方面努力的具體結果。

自大陸沉陷以來十六年之中，墨國沒有派使駐華，我七年前到墨國，當每次提出此一問題時，墨政府不藉口現在經費困難則必謂人才缺乏不敷分配等一些話來搪塞，實則有人告訴我，關於派使的問題，如果將來客觀的環境不變更的話，我們能够維持現狀，恐怕是兩國關係的最高峯了。但是，我聽了殊不以為然，還是繼續不斷的一再提出，並運用各種力量以期於成，墨政府到三年前總算是決定了，派遣一位代辦來駐我國，人選也內定為駐日本的某參事。但當時的總統是個左傾人物，臨時又改變說：我們還是先派一個特使訪問台灣，回來後再議，結果該使訪問後回去，就無下文了。

德國對現代中國問題之研究

——本年八月廿七日在中華民國國際關係研究所講演——

杜勉博士



杜勉博士

現任總統狄雅斯，是一個極為穩重而腳踏實地的革命家，第二他主張美國和墨西哥兩國的關係更須加強。第二他對我們的蔣總統是素來異常的敬佩，我與他是七年的老朋友，這次我回國時他託我帶了一幀照片呈給總統，他自己在照片上題辭，有「贈給中華民國偉大的領袖 蔣總統大元帥閣下」，由這樣稱呼中，可以窺見他如何衷心敬仰我們的總統。現在派使來華，也是他聽了我的話而決定實現的，假若不是沈部長月前訪問澳洲和日本的話，墨國大使可能早就來了。現在墨使蒞台，一方面呈遞國書，他方面將代表中墨商務協定換文，真值得欣慰，而我個人在墨西哥七年，兩件大事既已先後完成，總算沒有交白卷，沒有辜負使命。

今天我在這裏講了一小時半，各位耐心的聽，花費了許多寶貴的時間。報告也不週到，尚請各位先生指教，謝謝。

各位先生：吳主任今天邀請本人來貴所報告有關我們西柏林自由大學，從事研究中國問題的一般狀況，西柏林自由大學政治學系，是德國各大學政治學系當中，規模最大，聲譽最隆的一系，它擁有十一位專任教授，五位副教授，三十到四十位講師與助教，該系就在這些學人領導之下從事學術研究與著述，系主任 Richard Luventhar 是位著名的中共問題專家，在各大雜誌常可以看到他的論著。西柏林自由大學政治學系設有研究所，二年前以前政治研究所從事一項海外實際政治制度的研究計劃，這一計劃，在全德各大學政治學系當中，要算是一種獨特的創舉。

本人很榮幸能在政治研究所担任近代中國政治問題的研究工作，德國在過去對於「漢學」的研究，確有很深的學術基礎和成就，但是對於近代中國政治問題的研究，却仍然感到非常陌生，尤其對於中國近代史與中國政治現勢的知識與瞭解都覺

得非常淺薄，因為我們西柏林自由大學政治研究所希望利用本身膚淺的學術經驗和熱忱的工作態度，以有限人力與微薄的經費，開始對中國問題作一項比較有系統的研究，並希望因此而能在德國學術界中產生一點領導的作用。

去年二月開始，西柏林自由大學指派本人主持近代中國問題的研究，到目前已有一年半的時間，我感到非常慚愧，我們研究的成果可以說很少很少，不過在政治學系我們每學期在大學部與研究部各開一門有關中國政治問題的課程，以這樣的方式研究中國政治問題，這是自一九四五年以來的第一次嘗試。

今天我們所面臨的困難，主要的還是經費問題，由於經費的不足，使得研究工作遭受到若干程度的波折與困擾，幸賴德國外交部與國防部給了我們一部份的補助，使我們在去年七月開始，由本人和兩位研究生及一位中國學生的協助下，在政治研究所着手從事學術研究工作，一開始我們先從各種西方的報紙，評論以及二十五種定期刊物與雜誌當中搜集資料，大部份是西方國家出版的，但是其中有兩份中文刊物，而貴所出版的「問題與研究」就是其中之一，此外有五位研究生，在本人的指導之下，準備出版一本「中共的統治制度」，預計在九月底可以正式問世，該書是以德文著作的，這種以德文著述中共問題，在德國也算是個創舉，這就是我們即將完成的第一個研究計劃。

第二個計劃是西柏林自由大學與德國政策發展研究所合作，對中華民國台灣省的現有教育制度，正在做四個月的連續研究，這項研究工作很快也將完成，預計在明年初春，即可出版。上述兩個計劃完成後，本人將另外主持一項籌劃已久的研究計劃，就是出版一本自民國十二年到廿六年（一九二三——一九三七）間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內政史，這本書現在已完成了十章中的前四章，相信明年五月初可以出版。

此外，有兩位研究生正開始從事博士論文的寫作，其中一位研究「中共對中南半島——泰國、緬甸和馬來亞的文化外交和宣傳」；另一位研究生想利用三到四年的時間，來研究中華民國政府在台灣省這些年來的經濟開發和社會建設，以供給自由世界開發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擬定政策時的參考。另外本人還計劃和四位從事博士學位的研究者，將在明年夏天再度來台，對於台灣省地方自治問題，作三個月的實地考察與研究工作，不過這項計劃之能否如期進行，要看福特基金是否給予我們補助才能決定，如果福特基金會能够及時補助，我計劃在明年四月初就開始執行我們對這一問題的研究計劃，到時候，我希望能增聘五位專任的高級研究生和若干位普通研究生並設立一個秘書機構。

以上所報告的與本人這次途經印度來到貴國，本來沒有什麼相連的關係，不過值得一提的，就是西柏林自由大學和印度孟買的「中國問題研究中心」有合作的關係，孟買「中國問題研究中心」是在孟買的學術界及知識分子和反共團體的支助下成立的，西柏林自由大學會協助該中心，從事擴大印度人士對中國問題的研究與瞭解，該中心規模雖然不大，但其所從事的研究工作都很有價值，有些方面實際上比西柏林自由大學政治研究所的貢獻更為有效。

星加坡獨立及其今後動向

吳春熙

馬來西亞聯邦成立未及兩年，內憂外患交相煎迫，構成馬聯的兩大支柱星馬突告分崩，消息傳來，令人震驚，姑不論星加坡今後的動向如何發展，馬聯失去了最有力的加盟邦，其本身抵禦外侮的力量，顯已削弱；即對西方民主國家在東南亞致力抑制共產勢力的擴展，亦增添困擾，此事徒爲親者痛而仇者快而已。

一 星馬分治的醞釀

星馬政治領袖歧見甚深，醞釀分治已久，在此之前，雙方嘗試圖經由談判加以挽救，七月間當馬聯總理東姑在英法養病期間，由副總理敦·阿勃杜·拉昔與星加坡總理李光耀進行談判，主要爭執一爲種族衝突問題；一爲馬聯中央政府政策的受干預問題。拉昔會要求李光耀停止「馬來西亞人的馬來西亞」(Malaysian Malaysia)的政治號召，承認馬來民族在馬聯組織內的特殊地位和權益，當被李光耀所拒絕，繼而，要求星加坡州政府不得干預中央的決策，李光耀對此要求亦有所保留。七月底談判決裂。拉昔對人民行動黨提出最後通牒，聲稱如果星加坡堅持李光耀路線，星加坡只好脫離馬聯獨立。人民行動黨對於此一重大決策曾召開首腦會議，外間謠傳，李光耀爲了爭取馬聯的繼續合作，不惜辭去總理，由該黨主席杜進才博士繼任，來緩和僵局和面臨決裂的危機，但在最後表決時，人民行動黨中央執委會一致支持李光耀路線。

八月五日東姑總理自倫敦返國，獲知談判未能獲得協議，曾致函杜進才說明爲了整個馬聯的安全與和平着想，不得不作星馬分治的決定，在他的函中明顯的指出：「要是我够堅強，能够完全控制局勢，我也許可以延擱行動，然而，我不能做到，所以趁我尚能容忍之時，我認爲用這種方法來和平解決我們之間的歧見乃是唯一的辦法，我懇請閣下贊同此事」。局面演變至此已無可收拾，人民行

星加坡獨立及其今後動向

動黨經審慎考慮後，祇好同意東姑的建議。八月七日東姑與李光耀簽訂「一九六五年星加坡獨立協定」，內容八點，主要爲：

「雙方將簽訂一項有關對外防務與互助之條約，規定：(一)雙方將設立聯防理事會，負責對外防務與互助事宜；(二)馬來西亞政府將在對外防務方面給星加坡政府以合理而充份之協助，惟星加坡政府亦應自其本身之武裝部隊中，派出合理而充份之部隊，擔任防務；(三)星加坡政府將授權馬來西亞政府，繼續維持其武裝部隊在星加坡所使用的種種設施及基地，同時，亦准許馬來西亞政府在外防敵時利用此種基地及設施；(四)雙方應允決不單獨與外國簽訂任何足以危害雙方領土獨立及防務之條約。」(第五條)「自星加坡獨立日起，雙方將在經濟事務方面合作，以求互惠，因此，雙方可能隨時在協商後設立聯合委員會或理事會。」(第六條)

八月九日雙方發表分治宣言，正式公告：「雙方同意星加坡已不再成爲馬來西亞的一州，而應立刻成爲馬來西亞外的一獨立自主邦國」。馬聯國會兩院旋即通過一九六五年「馬來西亞與星加坡憲法修正草案」。東姑對下院的演說中曾明白指出：「中央政府與星加坡州政府間所存在的嚴重歧見已到無法消除的地步，中央政府祇有兩項選擇：(一)採取壓制行動對付星加坡領袖；(二)准許星加坡退出馬來西亞而成立獨立國家。東姑採取斷然的行動，他的理由是：(一)星加坡并不效忠中央政府；(二)種族恐懼輕視與怨恨的種子已經在星加坡傳播；(三)輕視中央政府。

東姑總理會透露，當他在倫敦養病時曾對此嚴重問題縝密考慮才作最後決定，很明顯的，星馬分治的決定，揆諸東姑與英國關係之密切，以其對不列顛國協之尊重，絕不致事前未商獲英政府之同意而遽作此重大決定，英方所稱事前未獲通知，顯係掩飾之詞。

星馬分治，雙方文告以及事後的談話，表面上均能抑制保持體面，甚至各留綴合餘地，所謂君子交絕不出惡言的政治風度，究竟不能掩飾彼此間的怨懟和敵意。一般的說，宣言中聲明星加坡同意「退出」馬聯，事實上係東姑所主動，在星加坡則認為係被迫出此下策，甚至可以說係被「逐出」(We were ousted)。

二 馬聯分裂的政治背景

星馬合併的政治背景原極錯綜複雜，一九六一年東姑總理提出馬來西亞聯邦計劃時，本刊曾著論指出聯邦國家成立必須具備的四個條件：即(一)結合的願望；(二)獨立的願望；(三)各加盟邦在聯邦的地位完全平等；(四)政治意識與雙重效忠。馬聯的結合第一和第二兩個條件具備，第三和第四兩個條件有待於繼續努力，並且指出：「經濟利益和地方特別情形為馬聯未來最大的困難問題，此乃由於各地區的政治發展與經濟開發，彼此間相互懸殊，加盟地區的特殊利益必須獲得自立的保障」。(註一)

一九六二年當馬聯計劃談判期間，本刊續論星馬合併的政治背景，指出星馬政治領袖主要的歧見：(一)人民行動黨的政治號召，英國和馬來亞民族領袖頗存戒心；(二)馬來亞政治領袖對星加坡華人衆多問題，始終認為種族優勢是一種政治威脅，在東姑的心目中，星加坡為一個佔優勢的華人城市，對聯合邦的政治均衡，處於舉足輕重的地位，且將危害馬來民族的利益，除非星加坡華、巫、印三大民族已經發展成爲一個共同的馬來亞觀念，不會再有民族的矛盾時，才是星馬合併成熟的時機。(三)英國爲了在遠東的利益，一九五七年馬來亞聯合邦獨立，一九五九年給予星加坡自治邦的政治地位，同時運用「內部安全委員會」(Internal Security Council)，形成星馬互相制衡的局面，這是英國一向對星馬採取分治制衡的傳統政策。(註二)稍後，促成星加坡加入馬聯，乃因爲一九六一年七月間，星加坡政局起了急劇的變化，人民行動黨內部分裂，重要幹部黨員和親共份子脫黨，另組織「社會主義陣線」(Barisan Socialis)，使人民行動黨在立法議院形勢發生變化，同時

「社障」林清祥、李紹祖等利用職工總會策動工潮，掌握學運發動罷課罷考，星加坡政局的劇變，不能不使馬來亞當局提高警覺，在當時馬來亞領袖認為聽任左傾份子繼續囂張，一旦人民行動黨被迫下台，共黨勢力勢必崛起，而直接受威脅的不單是星加坡，且將危及馬來亞的安全，因此促成星馬的合併。由此可知星馬在結合之初原極勉強，而導致現在的分裂，其主要歧見和原因仍然是長久以來所積儲的問題。

(一)華人和馬來人爲馬來西亞聯邦組織內兩大民族，全馬一千萬人口中，華人和馬來人的人口比例約爲百分之四十二與百分之四十五之比；在星加坡一百八十萬人口中，華人佔一百四十二萬，百分比在百分之八十以上。這個人口比例，長久以來爲馬來狹隘的民族主義者深所嫉忌，他們認為在經濟上處於優勢的華人對馬來民族是一種無法抗拒的威脅，除非華人馬化到達滿意的程度，華巫兩大民族的和平相處是有問題的，因此馬聯憲法在經濟權益上處處扶植馬來人，抑制華人；在教育政策上逐漸消滅華文；在從政就業機會上優待馬來人，儘管星加坡在加盟時曾保留教育與勞工政策，兩年來馬聯中央政府對星加坡華人的抑制措施，造成華人經常懷不平之感。

人民行動黨原以爭取華人合法權益爲號召加盟馬聯，亦以此號召爭取選民，此乃爲該黨一貫的政策，因此引起馬來族極端民族主義者之反感，經常互相攻訐，馴至造成一九六四年星加坡兩次華巫衝突。當星加坡華巫民族糾紛騷亂時，馬聯中央政府充份運用警權，雖然予以有效的鎮壓，但在星加坡州政府仍深感警權旁落不能於事前或事後作適當的防護，亦引起星加坡華人的怨懟。

一九六五年五月三日，李光耀在星加坡人民行動黨中央政治局，發表以馬來西亞是屬於馬來西亞人的馬來西亞爲題的演說，他指出馬來人、中國人及印度人均係移來種族，任何一個種族都不能自認爲主人翁，凡是馬來西亞公民，就是馬來西亞的主人，結論爲「馬來西亞是馬來西亞人的馬來西亞」。雖然這篇演說沒有明顯指責東姑左右的狹隘民族主義者的成見，但公開警告馬聯不是馬來人的馬來西亞，這篇具有爆炸性的政治演說引起馬聯政府當局極端的不

滿，認為李光耀係公開對中央政府民族政策的挑戰，甚至於公開抨擊李光耀為馬聯「第三號敵人」（第一號為共黨，第二號為印尼），這些民族政策的歧見，無疑的為造成分裂的主要導火線。平心而論，拉曼左右的那些極端份子，是應該負起分裂的最大責任。無人否認，在馬聯各地區，華族對於工商業和金融勢力的掌握，是引起嫉忌和不滿的主要原因之一，其實在東南亞任何地區，華人都成爲每一個國家的重要基層，他們對當地任何方面的貢獻，甚至遠超過當地民族，無端的敵視和嫉忌是不應該發生的。

(二)馬聯有幾個代表華裔利益的政團，而基礎比較穩固的有兩個：一個是現以陳修信爲首的馬來亞「馬華工會」(Malaya Chinese Association 簡稱MCA)，純粹華人的組合，以馬來亞聯邦爲活動中心。一個是以李光耀杜進才爲首的星加坡人民行動黨(People's Action Party 簡稱PAP)，黨內重要份子包括華人、馬來人和印度人等民族，雖然不以種族爲號召，但以華人爲主體，這兩個政黨各有其不同的社會基礎。一般的說，馬華公會代表華人社會資產階級的利益，比較保守穩健；人民行動黨代表中下層華人社會，在星加坡獲得華人較多數的擁護。不過，在一九五四年底人民行動黨成立時在殖民地政府統治期間登記，係屬地方性政黨，依法活動地區僅限於星加坡。

當東姑組織聯盟黨(馬華公會，巫族統一機構和印度國大黨聯盟)，李光耀原擬排斥馬華公會，直接與馬來民族統一機構(CUM-NO)合作，但東姑堅決表示支持馬華工會。原因很簡單，在東姑的警覺中，至少馬華公會一班首腦人物係高等華人的結合，比較保守，政治慾望不大，組織散漫，容易控制，他們祇要能保有華人經濟上既得的利益便認爲滿足，容易爲東姑所左右。人民行動黨則不然，該黨一羣首腦人物比較精明幹練，政治主張和號召比較激烈，在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三年兩次的星加坡選舉中已充份表現他們在政治上的作爲。東姑於衡酌政治上的利害得失，以其所構想的以華制華政策，自然以支持馬華公會爲上策，他認爲只要能維繫幾個首腦人物，便能够掌握馬華公會。因此，導致李光耀轉而發動馬聯內部幾個反對聯盟政府的在野黨，籌組「馬來西亞人民團結總機構」

，由人民行動黨、馬來西民主聯合黨、人民進步黨、砂勝越人民聯合黨、及華巫達黨等(註三)聯合簽署發表宣言，并於六月六日舉行第一次代表大會，無疑的，此一反對黨聯合組織將與執政中央政府之馬來西亞聯盟黨對抗，李光耀這個行動，使吉隆坡與星加坡州政府間的裂痕越來越深。這便是東姑所稱的「已到了無法忍受」的地步。

人民行動黨當然不以偏處星加坡爲滿足，當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廿一日人民行動黨成立時，李光耀在其建黨演說中曾提出(結束殖民地主義建立一個獨立的馬來亞國，其領土包括馬來亞聯邦和星加坡殖民地)，「以生長在馬來亞和取得馬來亞公民權的公民建立一個獨立、民主、社會主義的國家」(註四)。一九五七年馬來亞聯合邦獨立，翌年人民行動黨發表「我們的工作任務」(註五)(The New Phase After Merdeka—Our Tasks and Policy)，一九五五年星加坡獨立，一九六〇年該黨中央委員會發表執政宣言「我們黨的不變的政治目標」(The Fixed Political Objectives of Our Party)(註六)在這兩篇人民行動黨的政綱均重申上述基本目標，這個政綱所蘊含的政治意義當爲問鼎中央政權，此乃不言而喻之事，但在馬聯組織下星加坡僅以一州資格合併，在馬聯憲制之下，下院一百五十九席中星加坡僅獲十五席，星加坡人口比例多於砂勝越和砂峇，但席次尚不及此兩地區，顯有偏頗和受抑制，如此單薄的議席，對中央政府的決策簡直無置喙之餘地，遑論運用議會的鬥爭。人民行動黨採取聯合在野黨的措施，似亦迫於現實政治環境而不能不團結反對黨的力量，與中央政府抗衡爭取政治的權益。

(三)星加坡係東南亞重要輸出入轉口港，有世界第五港之稱，其經濟繁榮完全仰賴貿易轉口，對印尼之轉口貿易關係密切，自一九六三年秋季印尼與馬聯斷絕貿易關係，印尼此一行動固係經濟自殺政策，但星加坡亦深受打擊，由於星加坡港口設備完善，擁有熟練技術工人及金融週轉機構等條件，過去印尼土產大都須在星洲加工出口，即泊來品之輸入亦大都經星加坡入口，一九六三年秋季以後，星洲經營印尼貿易商均被迫改業，由於經濟情況的變化，連帶發生的社會問題已使人民行動黨不斷增加壓力。在星加坡具有相

當深厚基礎的社會主義陣線 (Partied Socialis) 即乘機擴大其對職工組織的影響力，經常煽動騷亂，加以馬聯中央政府對星加坡華人經濟活動處處採取壓制政策，例如：英國公佈限制星加坡棉織品進口，雖經星加坡發動抵制英貨進口，迫使英放寬限額，但馬聯中央政府，竟將英國准許進口配額大部份保留給馬來亞境內的廠商，如此有意扼殺星加坡經濟的措施，更行引起星加坡政府的反感。

星加坡對馬聯中央政府的財政負擔亦為星馬爭論重要焦點之一，當馬來西亞協議成立時，星加坡政府收入的百份之四十歸中央，百份之六十留用，今年中央政府藉口對抗印尼侵略軍用浩繁，要求將百份比提高至百份之六十歸中央，未能為星加坡政府所接受。人民行動黨認為馬聯不斷的需索只換得中央政府對星加坡公民的壓制。這個爭議亦為導致分裂的重要原因之一，東姑曾明白指稱：「星加坡并不效忠中央政府，例如：中央政府感覺國防開支浩繁，而要求星加坡政府負擔一個合理的數額，可是星加坡政府除了與星加坡防務有關開支外，其他的幫助一概拒絕，甚至拒絕貸款一億五千萬叻元給中央政府作為發展砂朥越與砂峇之用，雖然在一九六三年是星加坡於簽訂馬來西亞協定附錄事項內已應允此項貸款」。

(四) 人民行動黨經過一九六一年內閣和清黨，黨內雖然獲得純化，但脫黨份子在外建立反對黨，在若干選區和社會基層，反對黨仍有其深厚的潛勢力，此可由一九六三年的立法議員選舉的議席分配上看得出來，儘管星加坡政府自汶萊叛亂事件發生後採取若干緊急措施，對社會主義陣線重要領導份子林清輝等加以逮捕，但無法澈底摧毀社陣的潛勢力！無論在職工組織中或學運社陣仍然掌握一部份力量，有人估計人民行動黨在星加坡的社會基礎力量僅略高於社陣，如若這個估計有根據，人民行動黨不能不重新檢討他們的政策。首先他們必須檢討長期在馬聯中央不平等抑制之下，能否維繫和滿足星加坡公民的要求？其次，如果繼續維持與馬聯合作，反對黨可能在選民中更容易散播反對政黨的種子，再其次，星加坡目前雙線貿易政策 (Double Crosses) 輒與馬聯財經政策衝突，特別是對共匪貿易包括對星加坡中共中國銀行存廢問題的歧見，如若放棄多邊貿易如何求取星加坡經濟的更甦，這些面臨的課題，人

民行動黨為鞏固其政權，不得不同意退出馬聯。

綜上分析，英國和馬來西亞政府之所以決定使星加坡獨立，在目前至低限度可以做到：(一) 解除種族衝突之嚴重形勢；(二) 保持在馬來西亞內部馬來族仍居多數之優勢，容易推行馬化政策；(三) 星馬分治可以阻遏李光耀在全馬擴展勢力之企圖。

三 今後的政治趨向

星馬分治後，星加坡今後的政治趨向，特別是外交與內政，為衆所矚目的問題。

李光耀八月九日在記者招待會中宣佈他的外交政策，首先談到今後與馬聯的關係，他聲明：「儘管吉隆坡政府與星加坡之間的思想歧見，我們仍願與他們合作共存」。此外，李光耀說明他的外交政策包括下列數點：

(一) 星加坡願與印尼友好合作建立貿易關係，此乃基於星加坡需要生存為前提，但不是被侵略，印尼如要與星加坡做生意，必需先承認星加坡是一個獨立自主的國家，而不是一個殖民地的傀儡國家，同時與印尼建立關係須先考慮到是否會危害馬來西亞的安全。

(二) 星加坡政府的對外政策既不「反共」亦不「親共」。

(三) 星加坡將與所有國家貿易，如果蘇俄要在這裏設立一個橡膠採購團，我們覺得沒有甚麼不可以。

(四) 星加坡將繼續與中共貿易，中共「中國銀行」可以繼續營業，但不容許北平人員直接指揮其業務。

(五) 星加坡將與印度、巴基斯坦、緬甸、泰國、柬埔寨、日本、英國、紐西蘭、美國、阿拉伯聯合國等建立外交關係。

雖然李光耀標榜「中立」、「非共」與「不結盟」，世界各主要民主國家已逐漸加以承認，惟中共匪幫、印尼及其他共產國家尚未加以承認，印尼對於星加坡的試探，最後的反應曾表示如星加坡確實獨立，則將與共匪協商同時加以承認，但認定星加坡是否真正獨立，則將以是否仍保留有英國軍事基地為準繩。到了八月十七日星

馬與英國共同協商星加坡基地達成協議後，星馬同意共同防衛，組織聯合戰委員會，星加坡願意提供軍隊前往北婆服務，星印關係的試探至此已漸明朗化。如衆所知，印尼對星加坡華人政權先天懷有極深的歧視和敵意。除非星加坡的政權落在「社會主義陣線」手裏，星印建交尚有一段路程；至於星加坡願意恢復與印尼的貿易關係在目前政治低氣壓之下可能性亦無多。值得注意的倒是中共匪幫加緊推行對星加坡的貿易傾銷政策。

中國銀行星加坡分行原已奉馬聯中央政府命令於八月十四日關閉，李光耀特准許繼續營業，其間微妙關係，外間談話紛紛，若分析中國銀行在星加坡的業務放款和透支數字，亦不難看出中共在星加坡的顛覆活動。姑不論中共匪幫是否即與星加坡建立某種外交關係，但必然加緊滲透作爲其顛覆東南亞的重要據點，至於傾全力以星加坡爲基地向東南亞各地區傾銷與走私，則更不待言。

李光耀曾聲明願意仍留在不列顛國協組織內，并且同意英軍基地留在星加坡，（至少暫時不至影響在基地受雇的職工生活。）但基地主權屬於星加坡，其對英國之密切關係可見一斑，此乃由於星加坡在東南亞所處的戰略地位之重要性，萬一星加坡陷於共匪與印尼之手，則馬六甲海峽將被封鎖，截斷東西交通，對整個民主集團之戰略，形勢極端不利，而對英國致力確保其在遠東的基地和政治經濟利益，首先蒙受其害，英國斷不願眼看星加坡走入歧途。因此，今後星加坡的外交多少受英國的影響，在短期間內當不至走得太遠，但亦斷非處處受英國的牽制。

人民行動黨當前所面臨的困擾，主要爲經濟和社會安定內政上的兩大問題。星加坡在經濟關係上與馬聯唇齒相依，倘若星馬的經濟有了隔離與阻絕，那將是星加坡沒有貿易的腹地；而馬來亞沒有對外的輸出港；再進一步看，星馬經濟政策若是背道而馳，更將影響及於自由亞洲與世界對於星馬的貿易。根據星馬分治協定，雙方將在經濟事務方面合作以求互惠，并隨時協商設立聯合委員會，以期達成經濟合作的互惠目的，吾人對此甚願預期一個泛馬共同市場的誕生，來解決星馬的經濟互惠和利益。

不過，星加坡今後的對外貿易，除了與馬聯保持密切關係外，

星加坡獨立及其今後動向

多邊貿易似爲其主要的政策，人民行動黨勢必致力促使星加坡成爲遠東的一個國際貿易港埠，李光耀一再呼籲的「我們必須生存」及其所標榜的「不結盟」外交政策，即蘊含質明範疇不限於自由國家。因此，西方國家如果不願意看到此一地區對共產國家發生太密切的關係，如何及時擴展對星加坡的貿易，乃至予以適當的經濟援助，似爲西方國家所應考慮的課題之一。

星加坡內政上仍一嚴重的問題，厥爲共黨勢力的滋長與潛藏，星加坡近十年來，教育與新聞事業深受共黨的滲透，社會人士思想紛歧、多少與人民行動黨社會民主黨思想和所謂「社會主義化」有連帶關係。「社會主義陣線」在星加坡的社會基礎不可忽視，在目前人民行動黨剛因星馬分治，一切政策尚未定型，一時看不出它的政治趨向，不過，星加坡獨立政府勢必對社陣份子採取嚴厲的壓制手段，蓋非如此，人民行動黨將無以自存。

四 馬聯的前途

馬來西亞聯邦由於星加坡的退盟，一旦失去有力的支柱，是否因此招致馬聯的解體，質言之，馬聯的另兩個加盟邦砂峇和砂勝越不會緊步星加坡的後塵宣佈退出？當星馬宣佈分治，峇峇部長斯蒂芬突提出辭職。外間頗多揣測，東姑會因此聲明北婆的加盟邦仍留在馬聯組織內。稍後東姑總理會前往砂峇和砂勝越，親自解釋導致星馬分治的癥結和歧見所在。一般言之，馬聯以馬來西亞聯合邦爲中心，以星加坡爲主要支柱，砂峇和砂勝越僅只是陪襯而已，如繼續留在馬聯組內，只是維持馬聯當前艱鉅的局面，其政治意義與作用不大。衡諸星馬分治的醞釀，東姑事前既與英國有所商洽，砂峇和砂勝越實際上仍然在英國控制之下，當不致即緊步星加坡後塵，而促使馬聯解體。馬聯如因星馬分治而宣告解體，非但對抵抗印尼的滲透侵略毫無補益，而直接蒙受其害的當爲首當其衝的北婆各邦，英政府當已計及此一利害關鍵，甚至可以說，最直接或受害乃爲大英帝國被逐出此一地區。

星馬有無再度合併的可能，此時加以揣測，絕無必要，不過，

（下轉第18頁）

希臘政潮之分析

希臘是一個文明古國，在古希臘時代，它無論在哲學、文藝、科學以及民主政治等方面，都有輝煌的成就；後人都承認，古希臘的典章文物是近代西方文化的搖籃。但，綜觀近代的希臘歷史，則無論從科學、經濟、工商業以及政治等角度來衡量，如與當今西方諸先進國家相比，希臘無疑是最落後的國家。這可能是現代希臘人苦悶、急躁與不安的根源。

近百餘年來，凡關心國際政治者都不難發覺，希臘政局有一項與眾不同的特色，希臘人常為「應否有一個國王」而爭，換言之，國王常常成爲希臘政治風暴的中心。就拿最近希臘的這次政治危機來說，也沒有脫離這一傳統的型式，它已使示威的羣衆高喊：我們要對「君主政體」作一次全民投票。更有進者，示威羣衆的口號與標語甚至攻擊國王的生母，弗萊德麗卡太后（Queen Frederika）。

實際上，在不久以前（一九四六年），希臘曾爲這一問題舉行過一次全民投票，當時大多數人都投票贊成實施君主政體；就因爲這樣，才迎立現國王康斯坦丁的伯父喬治二世來承襲希臘的大統。如今，相隔尚不到二十年，同樣的問題又再度引起爭論，而且有從「政爭」而激起「政變」的可能，實在令人費解。因此，有人認爲，古時的希臘人製造了許多美麗的神話，而現代的希臘人，其本身仍是一個謎。

希臘政壇現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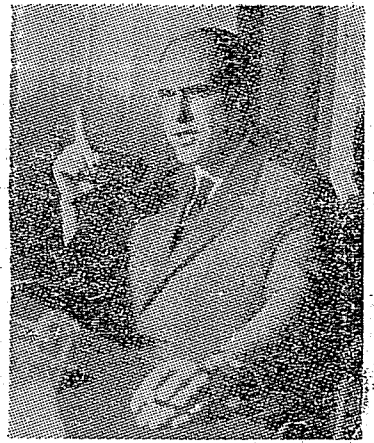
簡單地說，此次希臘政壇的主角是：國王康斯坦丁與前總理巴潘迪奧，希臘共產黨則是幕後的導演者。爲要明瞭此次希臘政壇的真相，首先必須對上述三者在今日希臘政壇的形勢作一解釋：

(一)希臘國王的政治地位：現年二十五歲的康斯坦丁國王（King Constantine），於一九六四年三月，繼其父保羅國王（King Paul）逝世而登上了希臘的王位。環繞這位年輕國王左右的則是一羣分子相當複雜的集團，包括：在傳統上擁護王室的保

王黨，頑固的保守派分子，以及那些思想急進的國家主義者。就其家族的淵源及其傳統的政治背景而言，這批人在思想上大多是反左傾的，尤其對共產主義心存戒懼，極端不予信任。希臘國王的政治地位並不十分堅強，它既不像中東地區那些國王一樣大權獨攬可以暢所欲言，又不像英國或日本的王室一樣對實際政治不聞不問；但希臘國王卻握有一張王牌——控制全國的軍隊與憲兵。所以，今天希臘國王實際上所要爭的，不單是維持國家的秩序與安全，而是挽救王權的旁落。

(二)巴潘迪奧與中央聯盟黨：巴潘迪奧（George Papandreu）現年七十七歲，是希臘最大政黨「中央聯盟黨」（Center Union Party）的黨魁，爲人機智狡猾，長於演說，極富煽動力，在希臘政壇素有「老狐狸」之稱。由巴氏所領導的中央聯盟黨在最近（一九六四年）的一次大選中獲得了壓倒的勝利，囊括了全國五三%的選票，在總數三百個議席的現國會中擁有一百六十八席，除在此次政潮發生後背棄巴氏者外，現仍掌握一百四十二席，實力相當強大。在四年以前新成立的中央聯盟黨，其組成分子亦相當複雜，包括





反君主立憲的共和派 (Republicans)，該派曾放逐康斯坦丁國王的祖父；反專制與反軍人獨裁的反法西斯主義者 (Anti-Fascists)。溫和的立憲派或保王黨 (Moderate Royalists) 該派擁護君主立憲政體，但反對國王干政，急進的自由主義者 (Radical Liberals)，該派的思想傾向自由與中立，

由於賽普路斯島問題，反英與反美的情緒高漲。

當初，促使這些思想紛歧立場各異的派系，能够團結在巴潘迪奧的名義之下，主要是基於一項事實：除非它們能够團結合作，否則要想推翻希臘戰後十餘年來由右翼保守派人士所把持的政權，決無可能。此外，巴潘迪奧的年齡也是促成這一團結的另一因素，因為巴氏已屆七十餘歲的風燭殘年，這無異給予那些野心政客一項有力的保證，他們不會被壓制或屈居人下太久。但，自巴氏主政十七個月來的情况顯示，此一保證並不足恃，因為巴氏一心意在扶植他的兒子安特里 (Andreas Papandreu) 作為中央聯盟黨魁的繼承人選。安特里是一個頗引起各方重視的人物，他是過去巴潘迪奧內閣的經濟事務協調部部長，在此次政潮中，中央聯盟黨與希共之間互通聲氣頗有勾結，而促成此一勾結的牽線人就是這位頗具政治野心的安特里教授。

在政潮發生的初期，巴氏的中央聯盟黨雖主張要把國王的權力削減至最低限度，但並不一定反對君主立憲政體；如今，由於雙方各走極端的結果，巴氏顯然有把君主立憲政體自希臘政壇連根拔除的意圖，如有可能，巴氏似不惜重演放逐國王的故事。

(11) 希臘現行憲法，共產黨的活動在名義上是非法的，被禁止的；但，事實上完全不是那麼回事。希共具有

極為嚴密的地下組織，其總部設在羅馬尼亞；在希臘內部，左翼民主同盟 (E.D.A.) 作為希共的同路人則是公開的祕密。希共及其同路人都把目前國王與巴氏的中央聯盟黨間的這一衝突，看作是惹事生非的大好機會，正竭力企圖加以利用。

但，在這次政潮中，希共雖發動民衆示威遊行，並發動工會罷工來支持巴氏，但卻表現出一項反常的現象：希共顯然不願在此時冒險造成大規模的流血事件。希共曾發出指示，一切暴動的行為應由巴氏的中央聯盟黨主動策劃，共黨的地下工作人員與左翼民主同盟必須置身事外。這並不是說共黨已經改變策略，不再唆使人民去犧牲或送死了；而是要讓巴氏的黨徒們去打頭陣，俾可坐收漁翁之利。希共對目前這種僵持下去的局面感到滿意，因為這樣將迫使雙方走向極端，而走向極左則正符合共黨成立「人民陣線」(popular front) 的意圖。

此次政潮的導因及其演變

希臘是一個多黨政治的國家，國內派系與政黨林立，黨中有黨，派中有派，政局極不穩定。據統計，嚴格地說，目前活躍在希臘政壇的大小黨派有三十二個之多；在戰後短短的十九年期內，希臘即曾舉行了九次大選。此次政潮的發端是由雙方對軍隊控制之爭而引起，茲分別說明如次：

自從中央聯盟黨贏得大選，由巴潘迪奧出而組閣以來，當初國王與總理之間尚能相處得很好，巴氏任命國王的親信格勞法略斯 (Petros Gargoulas) 出長國防部就意味着，新政府所標榜的「思想解放政策」(policy of ideological liberation) 將不涉及並危害希臘軍隊忠於王室的保守傳統。最近，一方面由於中央聯盟黨黨內左派的壓力，同時亦可能基於巴氏個人的野心，新政府提出了一套「整肅希臘軍隊」的計劃。據左派指出，在希臘軍隊裏面，有許多極端的保守分子身居高位，大權在握，他們秉承國王的意旨，聽命於北約與美國而忽視希臘的利益，尤其對政府的忠心可疑。巴氏此項整肅軍隊的計劃提出後，首先遭受親國王的國防部長的反對，因而

觸怒巴氏，乃要求格勞法略斯辭職，但格氏拒不聽命。為此，巴氏乃於七月十五日晉見康斯坦丁國王，要求簽署罷黜國防部長的命令，而由巴氏自兼。國王拒不接受，巴氏當即威脅稱，他將提出辭職。但這位年輕的國王竟不容巴氏有正式提出辭職的機會，立即邀請中央聯盟黨的另—領袖亞沙諾瓦（George Athanasiadis-Novas）出來組織政府，並在巴氏離開王宮一小時之內宣誓就職。國王這一戲劇性的行動大大激起了巴氏與中央聯盟黨的不滿。巴氏指國王這一行動非僅違憲，而且公然與人民為敵，誓將予以杯葛並與之週旋到底。這樣，頓時使希臘全國進入緊張狀態，此次政潮就這樣引發開來，迄目前為止，已使希臘將近四十日處於無政府狀態。

國王拒絕巴氏整肅軍隊計劃的理由是深恐紀律一向嚴明而具有優良傳統的希臘軍隊，將因此而暴露，易於招致共黨的滲透。同時，正在巴潘迪奧政府醞釀整肅軍隊之際，在賽普勒斯島上希臘駐軍的內部卻破獲了左翼軍官的一項秘密組織「Aspida」。據駐軍指揮官葛立伐將軍（General Grivas）向國王及國防部所提的報告透露，該秘密組織係由希臘政府的中央情報局（K.Y.P.）所策動，受巴氏父子支持，旨在發動軍隊全面叛變，以達到由巴氏父子操縱軍隊的目的。由於軍隊這一秘密組織的發現，使宮庭大感震驚，同時，亦由於這一秘密組織直接牽涉巴氏之子在內，這也可能是造成今日國王與巴氏二人勢成水火各走極端的原因。

但，狡猾的巴氏卻把他自己個人與國王間的政見不合，巧妙地轉變為一項憲法問題：國王是否具有否決總理選擇閣員的權力。這樣，無形中就將國王與人民對立起來。

國王的權力

今日希臘政爭的核心問題是國王的政治權力問題，各方辯論的焦點都集中在：君主立憲政體下國王的任務，究竟國王是一個統治的象徵或對選擇一個政府時可以發生影響力？

已故的保羅國王（康斯坦丁國王之父）曾這樣說過，國王在政治上雖處於超然立場，但在幕後卻能幫助作成決定。保羅國王在位

時，曾多次邀請希臘的戰時英雄巴巴格斯元帥（Marshal Papagos）進入實際政治，組織一個聯合政府，直至一九五二年，這位希臘的軍人政治家才接受國王的意見，出而組閣。一九五五年，巴巴格斯元帥逝世，保羅國王不顧各政黨領袖的反對，決意邀請當時不太知名的勞工部長卡拉曼里斯（Constantine Karamanlis）出而組閣。一九五七年，英國女王不願輿論的反對並在麥米倫當選保守黨領袖之前，授命麥氏組閣，保羅國王曾表示，英國女王的選擇麥米倫正同他當年選擇卡拉曼里斯一樣。但，保羅國王的政策，畢竟是具有伸縮性的，他並不十分固執己見，當一九六三年，他與卡拉曼里斯政見不合時，他還是不願冒被放逐的危險，向現實讓步了。

據康斯坦丁國王的憲法顧問史高里薩斯教授（Professor Sgouritsas）解釋稱，依據近年來的希臘歷史，一如保羅國王時代的情況顯示，國王在這方面可以審慎地行使有限度的權力（discreet authority）；國王可以授命一個政黨所提名的人去組閣，甚至也可以授命他自己選擇的人去組閣。該憲法顧問並指出，當年保羅國王首先徵召巴巴格斯元帥，後來提名卡拉曼里斯，就是行使此一權力，而且在這些事例中，國王的此種權力都為全國所接受。

但巴潘迪奧及左派人士則堅持，國王是統治的象徵，人民才是真正的統治者（the King reigns, the people rule）。國王提出忠告，政府作出決定；我們決不承認，國王有選擇政黨領袖或內閣閣員的權力。

問題的確相當複雜，雙方各執一詞，殊無妥協或讓步的跡象。左翼極端分子認為，這是重新挑起「君主與共和」之爭的機會。事情的真相都因感情用事而顯得模糊不清，人民顯然都站在巴氏一邊，所以巴氏個人的聲望極度高漲，但羣眾已被激怒。種種跡象顯示，如果再僵持下去，恐將釀成大禍。

結論

無論是由於不幸、判斷錯誤或別有圖謀，在一個君主立憲國家，一旦國王與人民形成了正面衝突之際，國王非但必須讓步，而且

註定失敗。在今日的希臘，我們撇開一切政治情緒、政治原理及政治偏見不談，這就是此次政潮發展與演變的方向。

康斯坦丁國王曾兩次試圖使中央聯盟黨的其他領袖出來組織政府，兩次都遭其本黨所否決，而歸於失敗。現在正在進行第三次，能否成功，尚在未定之天。一度據傳，由於黨內對他的頑強的態度不滿，巴潘迪奧似有妥協的意向。倘使第三次嘗試以及是項妥協意向仍不獲結果，則國王所能運用的手法，殆已計窮。最後，國王可能發出號召，試圖成立一個全國性的聯合政府，由一位黨外人士出來領導。此舉如果成功，這也只不過是給予國王一個喘息的餘地；如果失敗，除非借助軍隊的力量來推行他的意志，這無異引起政變，將冒天下的大不韙；否則，國王將發覺，他將更難以躲避巴氏所提的兩項選擇：授命巴氏重行組閣或立刻舉行大選。前者將使國王的聲譽掃地，後者則將使君主政體趨於毀滅。

此次政潮，巴潘迪奧將他本人與國王的權力鬥爭轉變為一項國王與人民的衝突，自己則搖身一變而以人民權力維護者的姿態出現，這一策略上的運用，已經獲得了報償，誠不愧有「老狐狸」之稱號，年輕的康斯坦丁涉世未深恐非其匹。康斯坦丁國王最大的失策，是一直讓自已與這位狡猾的總理捲入此一政爭的漩渦而不知自拔；無論他認定巴氏對軍隊的態度將如何使軍隊蒙受損害，國王必須記取，像希臘這樣一個國家，沒有東西更比國王與政府間的不和更能損害其政治的穩定性了，而國王則似乎把他自己在憲法上的憑藉置諸度外。

近百餘年來，希臘的王室有一段艱苦辛酸的歷程。康斯坦丁的祖父曾兩次被放逐，他與自由派政治家凡尼索羅（Eleutherios Venizelos）的衝突，迄今仍留下惡劣的記憶；其子喬治二世亦於一九一三年被放逐，當他於十二年後復位時，這是因為他默認麥泰撒斯（Ioannes Metaxas）的獨裁所致。最後，就拿康斯坦丁的父親保羅國王來說，保羅在位十七年，他雖未被放逐，但反王室的情緒則因其德籍王后的干政而引起。因此，背負着這樣一個傳統的包袱，年輕的康斯坦丁國王就應當記取歷史的教訓，竭盡可能地把王室永遠超脫於政治之外，尤其不可介入政爭。相反地，登基十八個月來

希臘政潮之分析

，康斯坦丁國王非但沒有這樣做，而且又使自己成為希臘政爭的中心，實在令人嘆惜。

不過，在巴潘迪奧方面也不是沒有錯處。平心而論，如果當初巴氏不堅持接管國防部，也不見得有損他的聲望，這樣就可防患於未然而使危機無從發生，這纔够得上政治家的風度。可惜巴氏沒有這樣做，他選擇了訴諸全國的道路，積極鼓動並擴大國王與人民間的衝突。如此，巴氏的動機就難免令人懷疑。

雖然，目前巴氏在人民心目中的聲譽很高，但這幾個月來他的處境並不十分順利，他的地位也不十分穩固，他在黨內的聲望不如他在國內的聲望。巴氏的中央聯盟黨雖在最近一次大選中贏得了希臘政治上罕見的勝利，但它不是一個單純的政黨，它是由各個派系所聯合組成的一個集團，其主要目的是取得政權。這次政潮已使該黨弱點暴露，內部這些派系已日見難以控制，有分裂的跡象。況一如多數中間黨派的政客們所遭遇的情況一樣，巴氏的政策已引起左右兩方的夾攻。右翼指控巴氏對賽島問題不敢放手去幹，並指控他在某種程度已恢復了共黨的自由；左翼則指控巴氏未能使共黨合法化，並指控他不去大力推行社會與行政改革。巴氏重行分配國家財富的計劃提高了他個人的聲望，但對希臘整個經濟的實際無補，加以此次政潮與罷工的影響，希臘經濟將遭遇一段艱困的時日，恐無法避免。因此，對巴氏來說，發動此次政潮亦不是一無是處。無論此一說法對巴氏是否公允，至少像一年以前這種樂觀情況已經完全改觀了。

倘使政潮再繼續拖下去，最可怕的危機則是右翼借助軍隊竊取政權；而且一項潛伏着的長期危機則正在滋長之中，因為此次政潮已經，並將繼續給予希共一項可乘之機，雖則巴氏自信能壓制共黨並控制羣眾的情緒，但他與國王的衝突卻無形中助長了「人民陣線」。在一個政治情緒極度不穩而高漲的國家，向任何極端的方向轉變都是危險的，均將使人民渴求穩定的希望破滅。

如今，希臘的憲法基礎已經動搖。除非中央聯盟黨內部發生一次真正的叛變，巴氏似終將獲得勝利。倘使巴氏獲勝，問題在於他將如何運用此一勝利。巴氏的聲望既已大大增高，他是否具有政治

家的雅量洞悉維持王室對希臘的重要？他是否準備在軍隊或國防部方面妥協而為國王留餘地，而最重要的則是將大選延期，直至情緒真正冷卻時為止？不然，此一勝利將證明得不償失。倘使希臘現行的制度，雖不够完善，遭到損毀或破壞，則獲利者將不是中間黨派，而是極端分子。

邱吉爾在生時曾對希臘人有過這樣的評語：「希臘人經常都分成許多黨派，各有其不同的領袖，彼此之間拼命惡鬥。自伯羅邦內辛戰爭 (Peloponnesian War) 迄今數千年來，希臘人的這一特性一直都沒有改變，而且他們在這方面的嘗試與活力也一直沒有減退。希臘人即使在全世界都反對他們或彼此自相反對時，他們都能生存下去；他們這種自相爭吵簡直成了一種癖好，樂此而不倦」。邱翁的評語，正是這一個多月來希臘政潮的寫照。希臘是北約的一員，也是我們的友邦，我們特在此引述邱翁的評語，殷切地希望希臘朝野引以為戒。希臘的真正敵人不是王室，也不是土耳其，而是來自北方的共產主義。

八月廿日脫稿

· 上接第13頁 · 就人民行動黨的政綱觀察，爭取星馬合併既然是該黨的基本目標，其黨內首腦人物在適當的時期和政治環境之下當願重新檢討，李光耀所說的願意再度合作，不過時間可能要十年十五年，我們認為如果馬聯民族領袖能重新討論其對華人的態度和政策，或許可以縮短等待的時間。 一九六五年八月卅一日

註一：馬來西亞聯邦計劃之發展「問題與研究」第一卷第一期P.69
註二：從星馬合併看馬來西亞聯邦計劃「問題與研究」第一卷第九期P.676
註三：「人民行動黨」(People's Action Party) 係由前脫離馬華公會的廿一日在星加坡成立，「民主聯合黨」係由前脫離馬華公會的該黨領袖為錫蘭人，反對巫人特權，「砂朥越人民聯合黨」係由一九五九年六月成立，該黨主席王其輝，祕書長楊國斯均為馬聯下院議員。

註四：Hee Kuan Yew: The Battle For merger, 星加坡政府出版局, P.146

註五：Ibid. The New Phase After Wardela—Our Tasks and policy, P.147—162

註六：Ibid. The Fixed Political objectives of Our Party A Policy Statement by Central Executive Committee Of the people's Action Party—1960 pp.163—174.

本刊四卷十一期目錄

漢城會議與亞洲現代化問題.....	雷崧生
世界金融合作之現況.....	林霖
日本參議院選舉後之政局動向.....	朱少先
日本與越南戰局.....	張棟材
現階段共匪之統戰政策.....	張敬文
李柏曼建議與蘇俄計劃工作改制.....	呂律
俄共組織現況分析.....	關素質
捷克經濟計劃制度「修正」的理論與實際.....	尹慶耀
一九六四年亞洲國家經濟的發展.....	馮世範
現代化與毛澤東的幻想.....	楊允瑛譯
匪區農業的兩項絕症.....	沈學經譯
蘇俄動態述評.....	一心
① 俄共青年團七中全會。	
② 重要經建二事。	
③ 俄南加強勾結。	
④ 伊朗國王應邀訪俄。	
⑤ 外國留俄學生今年畢業人數。	
每月大事記 (國際·敵情)	
編後紀.....	編者

日本與東南亞經濟開發

張棟材

一 日本與東南亞之關係

在二次大戰期間，軍國主義的日本曾在專恃武力為背景的「大東亞共榮圈」口號下，將其勢力推進到東南亞軍事佔領地區，竭謀取代英、法、荷的殖民統治地位。戰後日本從軍國主義的敗亡中重獲復興，已坦白清算了它過來對外擴張的錯誤，其對東南亞地區各新興獨立國家都建有友好關係，且更以亞洲工業先進國的姿態出現，開始向此一地區伸出援助之手。日本的此種前後迥然不同的轉變，就當前東南亞地區正陷於自由世界對共產集團苦鬥的情況來論，實具有非常重大的意義，蓋日本已由此表現出了它身為自由世界之一員，抱有分担捍衛自由世界任務的實踐精神。

關於東南亞這一個國際間通行的用語，通常都是指緬甸、泰國、寮國、柬埔寨、南北越、馬來西亞、印尼、菲律賓等國而言，也有將印度、巴基斯坦計算在內。相對地，更有將通行的「中近東」用語改稱之為「西南亞」。至於如何確定它的嚴密劃分，實尚有待於今後世界地理學者們的研究。日本學術界近年來對此似特別熱心，有些國立大學和民間團體都先後成立有「東南亞研究中心」等類專門機構。他們所致力目標有一共通點，此即日本應加強對該地區現狀的客觀認識而決定日本所應負的協力任務。

日本與東南亞經濟開發的緣起關係，最早見之於岸信介首相時期（一九五七年二月至六〇年七月）的「東南亞開發基金構想」，當時岸前首相會公開宣佈過他的想法是：「要以美國的資本；日本的技术；東南亞的人力與物力」三者相結合起來從事此一地區的經濟開發。

濟開發，而且岸氏也曾親身歷訪東南亞諸國為求取普遍支持鋪路。不過他這一個代表了日本政府及財經界的構想並未能立即見於推展，因為○美國不表示熱心，它的對東南亞政策是政治性重於經濟性，一切都寄望於東南亞公約所能發揮的效果。○以往軍國主義日本所遺留下的惡果，使東南亞地區的人民對戰後日本仍存有戒心，在潛伏的反感未完全消褪前，不免將日本所倡之「經濟開發」目為「變相的經濟侵略」。○日本吝於出錢，自然就減低了它的發言號召力。對日本所稱之技術輸出，亦只認其動機僅在於利己，並對其技術水準亦表疑問。

當前的情形則是美國的態度反轉過來了，它對東南亞的經濟開發較日本尤見積極，且有強制日本非與其如此合作不可之勢。而在另一方面，日本在八、九年來亦已以若干事實上的表現，扭轉了上述它在東南亞地區所處的環境：如○對東南亞諸國忠實地履行了賠償承諾，逐漸建立起互信基礎；○在年額約二億五千萬美元的對外經援支出中，主要地係以東南亞諸國為對象；○參加了對印度、巴基斯坦之國際貸款團及科命坡計劃與湄公河計劃等地區性開發計劃；○派遣了四百五十餘名科技專家，為東南亞諸國已訓練約達三千三百名之技術人員；○加強貿易關係，已使此一地區之貿易量佔日本輸出的三分之一與輸入的六分之一的地位。這些都促進了日本與東南亞的密切關係而構成爲日本參與該地區經濟開發的有利條件。

二 自由世界對日本的評價與期待

日本和西德同爲受累於軍國主義的戰敗國；但亦同爲在戰後廢

墟中達成經濟繁榮而列身自由世界免於赤禍的幸運國。日本和西德的戰後經濟成長，至今都還被視爲一種奇蹟。西德因有東德之陷入鐵幕，故在政治的安定上尙存有極大威脅。而日本在這方面則是保持了領土及人民的完整性，故更較西德爲幸運。

日本的聲譽在來自各方的高度評價中正日見增長，如馬來西亞東姑·拉曼總理會在最近一期的美國「外交季刊」中撰文稱許日本以自由經濟與民主主義獲致復興之成果，已足使其在亞洲樹立楷模而穩操領導權。東姑·拉曼的此一論調，的確可以反映出亞洲若干新興獨立國的共同心理，他們對日本的某些成就係基於同爲亞洲人的立場將其看做爲亞洲人的光榮。所以當去年秋日本以亞洲國家首次舉辦世運會成功後，即一向仇視日本的韓國亦不吝予以讚美。

日本經濟的高度成長及其潛在的經濟力，通過工業生產及對外貿易，殆已引起全世界的驚異注視。倫敦大學經濟系教授羅拔茲曾於今年五月間發表「日本經濟之奇蹟」一文，指出了日本在國際間的公認地位說：「日本促進迅速經濟成長的能力，已超越了所有的主要工業國家。日本現在是世界上最大的造船國，即在光學機械、鋼鐵、化學、汽車、電子工學、纖維等部門亦躍居全世的先進國之列。」這是並不含有誇張成分而可代表自由世界對日本的一項經過測驗的定評，也正是日本今天能在國際舞台漸具發言力的有力背景。

但在這種讚辭之外，日本也同時受到來自各方的指責，其中最能擊中日本弱點的是泰國外長乃他納所提的意見：「日本單是致力經濟繁榮，並不算什麼能爲。最要緊的是應該爲加強亞洲反共力量再竭盡其應盡之責任」。他如韓國認爲日本在美、蘇、亞、非之間八面玲瓏，跡近投機取巧；美國朝野對日本的普遍不滿則是指日本只利用了美國的軍事保護俾致經濟成長，却逃避在軍備上應有的努力與責任。歸納起來說，自由世界諸國對日本的觀感是嫌其貢獻不足。關乎這一點，日本自亦有所覺察，所以當本年春間佐藤榮作首相於訪美期間即曾公開聲明過：「日本負有對其他諸國之福祉善盡貢獻的重大責任，我們要接受這項責任」。這可以證明出日本當局具有對自由世界休戚相關，不容獨享經濟繁榮的見識。

日本的此種見識，已在其響應美國所提東南亞經濟開發計劃上博得自由世界的好感。美國詹森總統於本年四月七日發表有關解決越南問題的演說中，曾宣稱將投資十億美元寄望於東南亞之經濟開發；繼於五月十三日又發表演說表明了美國參加將爲支援東南亞經濟開發之「亞洲開發銀行」的意向；繼再於六月一日向國會提出爲請求擴大東南亞經濟開發的特別諮文。美國爲求取此一計劃之早日實現，尤一再期待於日本分担協同合作的重要角色。因之，美國政府自四月起即陸續派遣大員如國務院政策設計委員會主席羅士道及前任駐越大使洛奇、前世界銀行總裁布拉克二人爲總統特使訪問日本政府及財經界巨頭，展開一連串的遊說工作。這三人在日本發表的談話均係強調日本必須分擔在此方面的使命，如羅士道謂：「在現代世界中，已非單純之舊式民族主義所能獨自致力安全與繁榮，爲推進全體亞洲的經濟發展，日本應該負起重要的任務。」洛奇則稱：「美國對亞洲經濟開發計劃雖尚未制定具體計劃，但已準備提供資金及技術，且認爲在主持運用方面應以日本及亞洲諸國爲中心，如此則推動將較由聯合國主持爲佳」。布拉克更稱：「美國熱烈期待日本對東南亞開發計劃首先出面倡導，否則美國即難以進行實施」。

日本在這些年來都是固守在日美安保體制下一切唯以自身的安全繁榮是圖。如今日本對美國所提東南亞經濟開發的進一步合作——即既出錢亦出力的表示，却指向了日美合作的新途徑，其意義是等於已將局限於日本本土的安保體制，移向到日本以外的領域。

三 日本與美國的構想

七月十二日至十四日在華府召開的第四次日美間部長級貿易經濟會議，較過去三次更明顯地提高了日美在國際政治上密切配合的性質。該項會議已不是只限於解決兩國之間的貿易問題，而是要涉及如何檢討以美國爲首的自由世界的全球戰略，來決定日本對美國的協調工作。魯斯克國務卿在開會致詞中會稱：「兩國間的問題固然要討論，但世界政治經濟問題，尤不容忽略。」在三天會議期間

，第一天的主要議題是越南問題；第二天的主要議題是修訂日美航空協定問題；第三天的主要議題是日美對東南亞經濟開發的合作問題，魯斯克對此說得很明白：「日美對改善東南亞的貧困、落後與防止受侵略，應分擔責任」。詹森總統在其所準備的出席該會議之講稿中，亦曾加重說明此點，謂「日本和美國應有貢獻於亞洲和平與繁榮的共同目標，希望日美合作援助東南亞的開發，以謀亞洲的安全」。詹森總統該項演講雖因史蒂文生之急逝而臨時作罷，但白宮仍將該講稿內容發表，目的就在藉此明確宣佈日美合作的新途徑，讓日本朝野及國際間對此有充分理解。在日美該項會議的共同聲明中，也首在第一項內明示「確認促進開發國家，特別是亞洲國家的發展及其福祉之增進，為當前要務」，繼於第四項內表明「雙方一致同意本年四月間由詹森總統提議並經佐藤首相立即支持之東南亞經濟開發計劃，如一旦付諸實施，必可對東南亞諸國之社會經濟發展大有貢獻；雙方更歡迎亞洲開發銀行之創設成功，認為該銀行事業前途極為有望」。凡此均可見美國對獲得日本合作一事之重視。其更令美國當局感到欣慰的是日本的藏相福田糾夫在會議中已承諾了日本決定在二、三年內將對外援助額達到國民所得百分之十的程度，為數約六億美元，較現在將增加一倍以上。此外，日本對亞洲開發銀行的出資額，亦約定下同於美國的三億美元數額。

美國對東南亞經濟開發的構想自經公開宣佈後，在自由世界大致已收有良好的反應；其來自共產集團如共匪、蘇聯、北越等的抨擊，則將其譏稱為「鞭子與紅蘿蔔」，目為「企圖分化北越與中共關係」；「亞洲反共陣營之強化」；「對不結盟十七國家建議之外交宣傳」等手段。類似這種論調，在日本國內輿情上，亦有相當廣泛的叫囂，雖然它在目前尚不足以構成日美合作新途徑的阻力。美國構想的東南亞經濟開發計劃，實則都並不是新的設計，而只是對已有的表示了它大力支援的積極性。日本則是較前表示了出資的慷慨。在美國的構想中係以①運用既有之湄公河開發計劃。②創設亞洲開發銀行為兩大支柱，日本對此的協力程度可分別如下述

關於對湄公河流域的開發計劃，自一九五七年起即由聯合國亞

日本與東南亞經濟開發

洲遠東經委會（E C A F E）決定設置泰、越、寮、柬等四國調查調整委員會，由美、日、加等廿一國暨聯合國、世銀等十二個國際機構從旁協助進行。日本在參加調查部門中曾出資一百萬美元，照出資國別論，居於第四位。日本在地質調查及水庫設計上已建有了良好的信譽，但在建設部門中尚為未出資之國家，現在却輪到日本要以真正拿出錢來作為它致力東南亞經濟開發的誠意表現了。如在暫定第一期計劃中寮國之納姆水庫建設費，已由寮國政府提出二千七百萬美元的請求，美國並已表示若日本接受該項請求即願分擔半數，此舉不啻迫日早作明確決定的一項試驗。

其次如亞洲開發銀行之發起，這也是亞洲遠東經委會於一九六〇年春即已提倡的一項決議，並於一九六三年設立七人委員會，對出資問題交由包括日本在內的八國委員會處理。日本政府當時的態度認為時機尚未成熟，但經過「聯合國貿易會議」及「經濟協力開發組織」等對日本援助落後地區過於消極予以指責以及美國於今年四月以降連續派遣大員促請日本起而協助之後，則已一變而趨積極，日本在為籌設該銀行而成立之「專家諮詢委員會」中曾表示了它的願望為①出資二億美元，全力協助亞洲開發銀行的成立；②應請區域外之先進國參加並大量出資；③亞洲開發銀行應與現有之國際金融機構相組相互協力之綜合開發援助體制；④將來亞洲開發銀行設於東京，其主持者應由亞洲人組成。

根據上述，可知詹森總統所提美國對東南亞經濟開發構想的兩大支柱都是已在進行中的既定計劃，不過，今天美國特別強調該項構想的用意，乃是希望將該既定計劃從聯合國這一個無力的母體中拉出來，重新注入新血。詹森總統使布拉克在日本會稱：「聯合國只能對此計劃立於幕後推動，並不能作為直接的實施機構，何況它也無此財力！」並謂「美國熱烈期待日本首先出面倡導」，此即暗示日本應主動提出另行設立新的機構主持其事，以利美國構想的實現。

日本和美國之間在這方面的主張，多少還存有若干距離。日本在七月間日美貿易會議中對東南亞經濟開發的實施方法、對象地區等事也會向美國直率地提出它的意見稱：「美國必須尊重亞洲之自

主性；不能出於強制施援方式；尤不應附有夾帶條件。這裏面更含有日本對美國批判的某種反抗意識。

四 未來之展望

當前日本雖已在美國倡議之東南亞經濟開發計劃上，表示了和美國合作的承諾，但上述日本與美國在主張上的距離以及其對美國批判的某種反抗意識，却也是不容諱言的事實。此種事實之發生，自亦有其必然的原因。

最主要的原因是戰後日本對和平的追求常常是陷入不願付任何代價的株守心理，對戰爭存有過度敏感的疑慮與畏懼。所以日本對東南亞經濟開發未來前途最表關心的便是下列諸點：

(一)美國所期待於日本另組主持亞洲經濟開發機構，是否為誘導日本出而取代「東南亞公約」將其形成為反共國家之協同體與間接的助理戰爭態勢？

(二)美國對東南亞經濟開發計劃突然表現積極，是否為僅在於利用日本之經濟力及其與東南亞諸國之特殊關係為媒介，以期輔助武力解決越南政策？

(三)日本追隨美國之東南亞經濟開發構想，是否將徒招該地區基於反美心理而生之對日反感？且在戰火連綿中究能否從事經濟建設工程，亦為一大問題。

在美國軍事力量未能在越佔絕對優勢之前，類如上述日本所表露之疑懼，可能會逐漸加深，影響到它對美國倡議東南亞經濟開發的合作，最低限度將使其觀望不前。但美國要想改善此一情勢或預防此種情勢之出現，除了將越戰轉變為擴大反共國家參戰的國際化反共戰爭之外，那就是必須從速解除日美間在貿易、漁業、航空等具體問題上的對立。

東南亞經濟開發是一個長期性的計劃，美國和日本的資金和技術乃是不可缺少的原動力。日美兩國在這方面的新合作，當亦難免有一時的阻力，但就整體來看，它已開拓出超越日本本土領域範圍的雙方合作途徑，決不致發生半途而廢的情形。現亞洲開發銀行籌集資金工作已大致順利完成，預計明年春即可正式成立，日美共同致力之東南亞經濟開發計劃，在此前後必將訂定而更見具體化。如

果該銀行一如日本所願望地能將總行設在東京，也可預料到日本將對東南亞的經濟開發會更加提高興趣的。

本所出版專題叢書

本所為鼓勵學術研究，並提高敬情研究水準，自本年度起出版專題叢書若干種，現第一部「俄羅斯史」及第二部「中共土地鬥爭」將於本年十月十日出版。

俄羅斯史 呂律譯

俄羅斯史為美國耶魯大學教授模希加廖夫根據俄國古代編年史及其他許多寶貴歷史文獻編著而成，由我國俄國問題專家呂律先生譯，不但內容豐富，譯筆流暢，實為我國出版界不可多得之俄國信史，全書共三十萬言。

中共的土地鬥爭 黎明華著

在落後國家，共黨奪取政權之形式，係進行長期武裝叛亂，以農民為主力量，先據農村，後奪城市。而其裏面農民之主要手段，即係土地鬥爭。本書即以此為着眼點，研究中共之土地鬥爭，從而探索共匪此一路線對落後國家之威脅，如見之越共然，並明示台灣所進行之土地改革，可謂具有精關見解之精心作品，全書共六章二十萬言。

預約辦法

茲為優待讀者，特公開徵求預約，預約辦法如下：
一、預約期限：自五十四年九月十一日起至十月九日止。
二、預約定價：
○俄羅斯史：平裝五元，新裝五元五角，預約三元。
○中共土地鬥爭：平裝二元五角，新裝三元，預約一元五角。

○各級學校、文化機構、在學學生及軍人一律五折優待。

三、預約地點：
○中央日報大廈七樓本所出版組。
○台北市和平東路二段七十二巷九弄三號本所經理部。
○郵政劃撥金賬戶三四三六號。

各國戰時糧食動員制度的研究

何舉帆

壹、前言——戰時糧食問題的重要性。

參、我國抗戰時期糧食動員概況。

伍、結語——兼論今後我國糧食動員的趨向。

貳、各國戰時糧食動員制度簡介。
肆、各國戰時糧食動員問題的檢討。

壹 前言——戰時糧食問題的重要性

戰時糧食問題的重要，已是盡人皆知之事。

我國諺云：「兵馬未動，糧草先行」。軍志有云：「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無粟，不能守也」。這都是至理名言。

考之各國戰時史實。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美國主持糧食的胡佛氏說：「戰爭最後勝利，繫於糧食。糧食的足與不足，可以決定最後的勝利。」故美國於參戰之初，即於根據地之境波爾多，儲足供給四月之軍糧，連前方各地併計在內，竟儲有足供六月之數量；同時，德國參謀總長毛奇氏也說：「如欲不戰而亡德國，除非破壞德國的農業，封鎖德國的糧食，是不容易的。」後來，德國果然由於遭受海口封鎖，糧食來源斷絕，自一九一五年以降，即備受糧食不足的威脅，卒致軍隊譁變，國內發生革命，遂至全部瓦解。

當第二次世界大戰發生時，德國鑒於上次大戰的教訓，不先積極進攻莫斯科，轉而移兵佔領烏克蘭；日本急於進兵攻佔越南和緬甸。都是為了解決糧食問題，使能獲取「穀倉」可以從事較為長期的戰爭。但後來亦因糧食遭遇困難而失敗。

共產黨的「祖宗」列寧也曾說過：「革命的爆發與最後的成敗，是決定於人民與糧食；戰爭的持續是最後的勝利，也是決定於人

民與糧食。」

凡此均以足證明戰時糧食問題的重要性，謂為超越各種軍備實力之上亦無不可。蓋戰爭與糧食，關係至為密切。「堅甲利兵」，雖為戰爭中摧毀敵人與獲取勝利之工具，但兵器須由人使用；人之生命，又賴糧食以為支持。設一旦軍隊缺乏糧食，而欲枵腹作戰，絕無可能；何況現代戰爭，並不限於軍事，而國內民食，如發生恐慌，則人心浮動，秩序混亂，在在亦足以牽制前方。故戰爭不但須充足軍隊的給養，且須使全國國民無饑饉之虞。糧食在戰時之重要性，其理在此。

所以，各國每遇戰時，對於糧食均極重視。莫不列為國家總動員的主要部門之一。亦為「經濟動員」中的重要措施。

貳 各國戰時糧食動員制度簡介

茲先就世界第一及第二兩次大戰中，德、日、美、英、俄、法等六個國家的戰時糧食動員制度，將其主要資料扼要介紹，然後再加檢討。

甲 德國的糧食動員制度

一、第一次大戰時期

(一) 國內糧食原已不足——第一次大戰未爆發前，德國糧食除自生產者外，其小麥輸入每年幾均超過一百萬噸，最高記錄曾達一百八十三萬噸。可知德國糧食仍有一部份依賴外國進口。至於黑小麥、蕃薯及肉類，在其國內固能自己生產，但關於穀類部份，在戰時竟未有足量儲備。其原因有三：

① 政府對此嚴重問題初未注意。僅陸海軍兩方稍有作戰初期所需的囤糧，而對大城市及工業區的糧食供給，則未能及時積儲。

② 政府以爲戰爭期間不致過長。例如當凱瑟爾親自出征時說：「朕至聖誕節必凱旋返國。」故一切準備，均未充實。

③ 縱欲儲備，需款甚鉅，一時不易籌措，且工商界一向反對存糧，因恐政府積有糧食，可供調節糧價，與彼等操縱物價的心理恰正相反。

所以，在軍事動員之後，由於當時西部及南部國境陸地均遭封鎖，糧食輸入停止，更由於戰時消耗特多，國內糧食原已不足供應。而戰時且因農業勞動者之征集，肥料不足及飼料輸入困難，以致糧食產量減少百分之二十，其無法支持長期戰爭，實爲勢所必然。

(二) 實施定量配給制度——當時德國政府面對糧食不足情勢，乃實施計口配糧制度，即按人口配給每日必需的糧食，對於重勞動者所分配的較多於常人，而對軍人亦予增配，以保持其體力之健康。但因糧源短絀，配量一再減低，在此困難時期，一般人民雖具有民族意識，如能取得國家之所予，已告滿足；但富裕人民則憑藉財力，時常索求配額以外的享用，因而引起國民之間的普遍不滿，影響國民精神的團結。而且一般物資管制又欠完備，造成不均不現現象，招致人民怨恨，亦構成其戰敗的因素之一。

二、第二次大戰時期

(一) 承受上次大戰的教訓——德國鑒於第一次大戰主要的敗因爲糧食不足，故在第二次大戰前除力倡農業自給外，並曾逐次核減食料品的輸入，限制國民的嗜好，強調卡羅里營養之重要，及獎勵食用廉價的植物質糧食等，又規定在麵包中混入玉蜀黍粉，禁止使用米麥爲飼料改用馬鈴薯、甜菜屑、玉蜀黍、人造酵母及由木材中提取消物質作爲代替。因此，一九三二年糧食自給率已達百分之七十五

，並由於兩次四年計劃（一九三三—四〇年）的實施，重新整頓農業，確保糧食增產，至一九三七年自給率又增至百分之八十二。一九三八—三九年農業得到大豐收，其糧食的庫存乃告充實。

(二) 納粹糧食動員措施——一九三三年納粹制霸以來，已作戰時準備。對於糧食動員，至爲積極。其先後所採的措施及其成效分述如下：

① 制訂「節約自給」的糧食政策——即着重倡導飲食習慣與實施消費規則，將食用動物質糧食之習慣，轉移爲食用植物質糧食的習慣，以節約動物質糧食，增高其國內自給的能力。

② 奪取佔領地區糧食——德國在一九三八年初期在其所謂舊德意志領土內的糧食自給率爲百分之八十三，到了一九三九年三月由於佔領地之逐漸擴大，在所謂「大德意志」領域中，其糧食自給率已達百分之八十七，計增加百分之四。但仍然有百分之十以上必須仰賴其他國家供給，故欲求完全自給自足，殊不可能。況且在佔領地區內，因戰禍影響，農業荒蕪，其供應亦必困難。

③ 計口配糧早有準備——德國在第二次大戰中，懷於上次大戰的教訓，對於計口配糧制度，早有準備。在開戰同時所實行的計口配糧需用的「配給票」等，已早在開戰前一年、二年印就。故進入戰時後，未曾發生混亂狀態。

④ 發明注入維他命的人造奶油——使人造奶油含有維他命A或D，以維持國民營養。德人稱爲「抗病性食品」。

⑤ 糧食消費質與量的降低——此點有下列事實及其成效：

① 開戰時，德國肉類供應較戰前減少百分之十一、脂肪減少百分之五·七。但馬鈴薯則增加百分之十四·二。麵包增加百分之八。這是由動物質與植物質食物長期轉變政策的效果，而由此亦可見糧食品質已經減低。

② 主要糧食分配量，在大戰開始第四年，復行顯著削減。但如與第一次大戰期內一九一七年比較，脂肪類尚增加約二倍左右，這可說明納粹德國在二次大戰時，物資動員能力，已有增強。

③ 戰時糧食分配，以軍人與重勞動者爲優先。並較一般消費

者配給的麵包、脂肪與肉類等，超過二—三倍不等。而對第一線部隊給養，尤為豐富。可見此等肩負特殊任務者，已被特別重視。

(二)戰敗的要因仍在糧食——其情形如左：

○德國於開戰後，利用戰前儲備糧食，與緊急生產之補充，在戰爭規模尚未擴大之際，軍糧民食的配量，尙能維持戰前水準。

○嗣後，在農業生產方面，又由於農業勞動力的減少，農業機械及役畜能力的低下，肥料供應缺乏等因素，其產量即逐漸發生減退，而仰賴外國輸入，亦已發生困難。

○自一九四二年起德國陷於長期兩面作戰以後，由於戰場消耗過鉅，供應能量有限，不得不極力壓縮國內消費，卒致一般人民食物中所需的維他命與其他營養素逐漸降低，甚且對前方的給養，亦受到影響，可見其糧食動員能力仍未能追隨戰爭發展，導致後勤戰力的衰竭，是其最後戰敗的重要因素。

乙、日本的糧食動員制度

日本在第二次大戰中與德國同為侵略國家之一。事實上早自第一次大戰後，即已深刻認識國家總動員的重要，故無論平時與戰時均致力培養戰爭經濟潛力，積儲重要物資。但日本為海島國家，其本身原已缺糧，一旦投入戰爭，只要戰爭時間延長，即是它的致命弱點。茲分述其糧食動員情形如下：

一、對糧食生產的管制

(一)農田水利的調整——由於戰時糧食問題的重要，為確保糧食生產，曾制定「農業水利臨時調整令」。依其規定如遇旱災發生時，可授權地方長官，對於調整當地農業水利事項，採取必要的措施。例如調整水利地區，調整管理人及代表人等。

(二)農地的管理——由於軍需及生產力擴充業務之發展，為免影響耕地的崩毀及妨害農業生產，曾制定「臨時農地管理令」。其主旨有三：

○農業耕地除耕種外，不得作其他使用。欲以耕種以外為目的使用農地時，應經政府批准。

○休閒地（荒廢土地）之強制利用，使其適應國家需要之方向。

○對農地所有權者指定農產物之種類、地域及其他事項命令耕種。並對不急不需之產物，加以限制或禁止。其利用原則，除耕種糧食產物外，禁止其他作物（如桑、薄荷、除蟲菊等）。

二、對糧食消費的限制

(一)米穀碾白的限制——以節約食米為目的，命令碾米業者精製之白米較糙米之重量不得少於九成四的限度。例如每百斤糙米碾製白米不得少於九十四斤。

(二)酒類製造的限制——製造酒類除經財政部長許可外，其製造數量不得超過一定製造石數。

(三)小麥及其他輸出的限制——為節約食米，須對米糧以外確保所需的代用食糧。故對小麥及米穀以外之穀物、穀粉等輸出，施行限制。

三、對糧食管理與配給

(一)主要糧食由國家管理——即對米、麥、雜糧等，作有計劃的供需：

○政府對於米穀配給認為必要時，得予定價統購，以為供應。

○加強外米輸入，以補不足。

○規定每人每年一定消費量，算定每戶全年需要量，以利統籌。

(二)概算米、醬、釀造等需要量，並加以適當限制。

(三)保留種子需要量，以確保增產。

(四)實施有計劃配給——自昭和十六年四月一日起開始對六大都市實施計劃配給。嗣後復再擴大與加強：

○整備配給機構，由批發業與零售業者合併組成配給團體。

○按各種年齡與勞動程度，分別規定配給量。大致尙能維持國民最低生活。惟至戰爭末期，配量一律減縮，並搭配雜糧及

獎勵麵食。

(三)戰爭末期的糧食對策——在戰爭進行中，日本國內糧食的生產，由於肥料、資材和勞力的缺乏，及耕地面積因修築軍事工程與擴充工業而有減少，其產量已日趨減低（據統計各種作物產量較戰前減低百分之二〇至四〇左右）。他們原是糧產不足的國家，過去尚可依賴所謂外地之朝鮮、台灣等地的供給，而由於戰爭的原因，通貨膨脹問題嚴重，外地本身之消費量亦急驟增加，相反的對日供給量遂見減縮。當時唯一對策，就是設法從南方地區獲取來源，加強輸入，但由於戰局惡化和船運不足，使遠距離的海上運輸，亦無法滿足其預期的需要。因此，在戰爭末期，遭受到糧食的極度困難。其所採取的對策有如下各點：

- 建立日本與偽滿糧食一體自給——其具體政策為昭和十八年十二月閣議決定的「有關日滿糧食自給措置要綱」。由偽滿陸續輸運大量大豆、豆餅、高粱、玉蜀黍等接濟日本，作為主要糧食按戶配給。
- 訂定國內糧食供給增加方策——決定薯類與米、麥兩項共同視為增產重點。
- 強化收購糧食及配給管制並決定對主要糧食縮減一成的措施

④制頒糧食管理法，加強米、麥管理分配。

⑤創立「食糧營團」制度——以「食糧營團」為綜合配給機構。

(四)戰時糧食營養基準量之制定——日本戰時最低營養量，係以維持國民健康及加強生產力乃至廣義的戰力所必需而不可缺的數量為基準。他們在戰時能注意此點，是很難得的。其原則為：

○對成人、青年、學童、幼兒、產婦等分別訂定最低營養基準

○研訂決戰期最低基準食物量，包括主副食在內計十八種。

以上是日本在第二次大戰期內關於糧食動員制度的實施情形。

但因日本原為缺糧國家，平時既需仰賴國外供應，戰時由於生產減退，國外來源斷絕之後，立即感到恐慌。雖然不得不以削減民需為手段，以求確保軍需之充足，而由於日本軍閥估計不確與戰略錯

誤，致使戰爭延長，而且四面受敵，孤立無援，終因一切資源無力配合戰爭需要而趨於失敗。不過，它在戰時實施的配給制度，確已做到合理有效。所以，在戰後迄今，為求經濟的安定與復興，仍繼續施行。但配給量及各項規定已有放寬。其內容筆者曾經寫過「日本現行米穀管理制度及其問題的研究」一文，可供參考（見五十二年七月七日中國糧政季刊第二十七期）。

丙、美國的糧食動員制度

一、第一次大戰時期

美國為資源豐富的國家，農業生產力甚強。平時既有雄厚的經濟潛力，戰時亦易於迅速擴張。但在第一次大戰中會極力高唱糧食節約。當時主持糧食的胡佛氏對於糧食節約的必要性。有如下的說明：

(一)物資及生產力的保存與節約，其意義在於以現在的貯蓄資源充作戰時的需求。

(二)排除消費經濟的浪費，其意義為可使輸出剩餘量之增大；其結果則可增加支援協約國的需要，並使美國本身也得到經濟利益。

(三)若不能實行節約時，將引起國內物價騰貴。高物價雖能促進物資的節約，但會使一般人民的生活發生困難。

但美國為實行糧食節約，並不採取「強制定量配售制度」。胡佛氏在當時所提的理由有四：

(一)美國國民百分之五十為糧食的生產者或與生產者有密切關係的。故實施強制的消費管制，亦難發生效果。

(二)各地方各種糧食消費習慣不同。

(三)貧民消費限制無甚意義，因為他們所消費的已不超出生理需求的必要程度以上。

(四)如實行強制管制，必須發行「配售證」及支付其他行政經費，每年則需支出一千萬元以上之鉅款。

此外，他又舉出強制消費的種種弊害，如對違反規定者制裁手

續之繁瑣，拘束國民之自由等等。

因此，美國主張在可能範圍內務求避免強制，而依國民自動自發的限制，以實現糧食節約為佳。其所採取的措施，是從施行宣傳與公眾教育着手。曾取得全國各有關機關、地方自治團體與各種愛國團體等之協助，進行下列工作：

(一)對一般消費者，實施公眾教育，使其充分理解糧食的重要性及排除浪費的行為。

(二)指導各家庭在不影響營養原則下，講求糧食節省的最善方法。

(三)使人民理解糧食與其營養價值，節省糧食及代用品的使用結果，遂使美國人民均能依照糧食管理局的期望，努力改善消費經濟，免除無謂浪費。

二、第二次大戰時期

(一)農產增產方案——美國農業仍然是全國各項企業的原動力，對全國經濟狀況有極重大的影響。故在戰時非但要設法使總生產量增高，而且要使各種產品依照一定比例，增加生產。其增產方案有如下各點：

①擴展農業技術，提高每一畝土地的生產量，使農產品能增加百分之四十產量為主要途徑。其方法為：①改進施肥，②新的農業技術之採用，③土地用途加以有利的變更。

②增加農民的收穫。由於農民人數遞減之趨勢，可使每一個農民的生產量超過百分之四十的數字。

③擴大農業投資，加強信用貸款制度，使農民能有購備新式器材與裝備的力量。

④廣泛使用各個農民的耕種計劃，由政府予以適當協助。

⑤訂定合理的農產品價格政策。

(二)物資定量配給制度的建立——美國在戰時會實行部份物資的配給。少數食物有在配給之列者，其配給的目標有三：

①調節缺乏物資的分配。

②減低需求，並因此保存為其他更重要生產品所需要之少量資

各國戰時糧食動員制度的研究

源。

③限制龐大部門之使用，並因此可以協助其管制，以穩定國家金融。

美國農產豐富。在戰時對於盟國均有援助，而且還有鉅額之剩餘，其列入配給之食物僅以符合上述目標者為限，如肉類是。此種配給制度因未能使人民有足够的瞭解，以致影響配給的效果，尤以石油與肉類為甚。但並不影響其整個經濟動員的力量。

丁、英國的糧食動員制度

英國由於地處海島，平時民生必需物資即賴國外供給，一旦進入戰時，其物資之短缺乃為必然的現象。故戰時配給制度之實施，在英國尤屬必要。而在第二次大戰中，它所實施的各種民需日用品配給制度，亦最為成功。茲就糧食增產及配給部門分述如下：

一、糧食供應方案

(一)增強生產能力——英國戰時物資動員最脆弱之一環即為糧食問題。其平時的海外依存率已達百分之六〇至七〇，即自給程度尚不能供應半數的需求。因此，在戰時之主要對策，首先就要增強其國內生產能力，早從一九三二年開始已以政府補助政策為中心，實施增產運動，其重點置於小麥、甜菜與畜產品方面。但英國的農業形態原是以發展畜產農業為其主要特徵，於開戰後不得不轉換為生產農作物為主之形態。因此，戰時糧食增產政策乃集中於增加耕地面積與農業機械化兩點。其努力成果如下：

①耕地增加狀況——在一九三九年會規定每開墾一耶卡耕地（單位面積），由政府發給兩鎊之草地開墾補助費。當時計劃戰時要增加二百萬耶卡耕地面積。繼於一九三九至一九四〇年度先後墾植草地二百萬耶卡。而後又以一九四〇—四一年冬為目標，再計劃開墾二百萬耶卡。一九四二年度亦有同樣之開墾計劃。結果使英國耕地由戰前之一千三百萬耶卡增至一千九百萬耶卡。據農漁部發表自一九三九年以來，穀物種植面積已增加百分之八五·〇七，其中小麥面積約增加百分之三五·〇六。

②農業機械化措施——於一九四二年設置農業機械化局努力推廣

使用結果，已將戰前之五萬二千台拖拉機逐漸增加至十二萬台。同時為配合增強農業人力，創設婦女農業服務隊（總人數約達五萬三千人）與使用俘虜勞力及臨時動員軍隊學生勞力，以補勞力的不足。

(二) 增強儲備能力——由英國糧食國防計劃局負責研究設計工作。其儲備方案早於一九三八年六月即已制頒「重要物資貯藏法案」。依據該法案規定，由政府發出之經費一九三八年為八百五十四萬六千鎊，一九三九年為五百零六萬五千鎊。在糧食方面的戰前準備，遠較第一次大戰期間準備為佳。但因糧食的儲備需要廣大面積與相當設備；同時若干食料品（如鹹肉、火腿、牛油等）在其性質上亦不適於長期貯藏。故雖有計劃與經費，而在實施時仍難免發生各種問題，因而不易完全達到預期效果。

至於上述的增產方策，後來一方面受到勞力與肥料不足的影響；一方面農業機械之輸入又全賴美國供應。同時，戰前所能自給的程度又嫌過低。因此，在物資動員中的糧食供需上，不得不實施配給制度，以確保軍民基本生活的安定。

二、戰時糧食配給制度

(一) 糧食配給的方式——戰時英國糧食配給制度之實施，始於一九四〇年。自是年一月八日首先對鹹肉、牛油及砂糖三者採用配給票制。後再逐漸實施全面配售。其主要方式可分為三種：

① 定量分配制——一九四〇年一月八日開始實施，主要配售品為肉類、脂肪、鹹肉、茶葉、砂糖等，係於一定期間對每人定量分配。例如砂糖每週每人配售十二英兩、鹹肉四英兩、牛油四英兩。至於主食的麵包，雖未實施配給，但從一九四二年三月二十三日以後，因小麥粉磨製程度改細為粗，由過去的百分之七五增至百分之八五。及至進入戰爭激烈之一九四三年後，復由糧食大臣提出警告說：「政府雖已決定將小麥製粉率提高至百分之九〇，且須將國內生產之大麥、燕麥混合磨粉，但仍然不敷需要，因此，要求全體國民必須進一步節約消費，必要時亦將實施配給制度」。同時，為彌補麵包供應不足，獎勵人民食用馬鈴薯，而使一九四三年一月之馬

鈴薯消費量比較上年同月增加百分之十八。由此，可見英人戰時生活艱苦之一斑。

② 點數配給制——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十七日起實施。其主要品為對輸入之肉類、魚類等罐頭及米類、乾燥豌豆、乾菓、煉乳、菓汁、糖蜜、餅乾等，實施點數配給制，規定對每人一次發給四週間之一定點數，在其購置範圍內允許自由選購。

③ 特別分配制——對牛乳等類食品，指定妊產婦、未滿六歲兒童、學童、病人等規定每日定量優先配售。至對一般人民則按登記資料予以適當的分配。

(二) 糧食節約的管制——戰時英國除實施糧食配給外，對糧食節約亦有管制。即從一九四一年三月十日起規定飲食店的食客，僅能對肉類、魚類、雞鴨肉類、蛋類之中選定一種菜品，如有違反，食店與食客雙方均應處罰。一九四二年六月一日起復限制食店最高餐費不得超過五仙令，並對威士忌、琴酒與啤酒規定最高價格。

上述英國之配給制度，由於公平合理，貧富享受一致，英國人民雖然時感生活物資的嚴重缺乏，但對政府並無怨言。後來得到美國的援助，遂使他們在二次大戰期中渡過物資匱乏的威脅。

戊、蘇俄的糧食動員制度

蘇俄以赤化世界為其國家目標之一，基於其「侵略」戰爭的需要，在經濟上隨時都在動員的準備中。茲就所獲資料，先為簡介它在第二次大戰前及大戰中有關糧食動員制度，然後再就戰後經濟計劃有關糧食部份推行情形一併敘及。它是我國最大敵人之一，其內容要稍為詳盡一點，作為我們的警惕。

一、第二次大戰前蘇俄糧食動員的準備

蘇俄的共產經濟是在國家嚴密控制下有計劃有組織的統制經濟制度。故在農業上要做到「集體化」。在一九二九年以前，蘇俄農業尚以個人農業經濟為主體。在一九三〇年以後，即將帝俄時代全部耕地三億六千七百萬公畝中的一億五千二百萬公畝地主皇族和寺院所有土地和八千萬公畝富農所有土地以及一億三千五百萬公畝中

農以下農民所有的土地，重新分配確定了新的生產關係，而使全俄百分之九十的耕地納入到集體農業組織中實施所謂「合作生產」。亦即所謂「集體生產的合作農場制度」。簡稱為「集體農場」。其經營形態有下列的特質：

(一)土地國有，但許可集體農場長期使用，並免收費用。

(二)農場財產為合作社社員所共有，即指共同耕作使用之農具、公共處所、畜舍、倉庫、俱樂部等建築物及其附屬設備，以及生產收穫物、家畜共同基金等一概在內。

(三)農場經營，由社員選出之委員會負責管理，重要事項須通過社員代表大會之承認。在大會中須依政府指示決定農作物種類、耕作面積和分配社員勞動日數與收穫物之處理等事項。

(四)全體社員分別編成若干小組，由各小組担任一定地區的耕種作業。各社員之勞動成績視勞動作業難易程度評定之。

(五)收穫物出售之收入，除扣減應繳國家之捐稅及各項必要開支和公積金外，其餘由社員分配，並以評定勞動日之多寡，作為分配現金和實物的基準。

此種制度之推行，其目的在便於強迫生產，強制勞動以及控制其收穫物。完全是剝削性的「農奴」制度。

此外，參加集體農場生產的社員，每戶仍可保有個人經營之自耕地約半公頃左右，其收入全歸個人所有。可知戰前蘇俄集體農場形態仍未達到全部「社會主義公有化」階段，即在戰後亦未澈底消滅私有化的經濟活動。但由於集體農場存在着許多矛盾，自一九三〇年強制推行後，其農業生產一時呈現減退之勢，直到一九三七年實施改善農場組織與農民待遇，始逐漸提高產量。由此，足以說明蘇俄農民對集體化之反抗心理以及生產意慾對於糧食增產之影響。

二、第二次大戰中蘇俄糧食動員的措施

(一)戰時農業生產——蘇俄從一九三〇年起實施集體農場強化政策以後，經過十年之久，始將集體農場所謂大型農業經營的特質發揮出來。但在此時適逢二次大戰爆發，德軍攻擊俄土，而於開戰初期，蘇俄連遭敗績喪失了聯邦西部的廣大地區，被淪陷的耕地面積佔全俄耕地總面積百分之四七，其飼養的家畜佔有百分之四五。受

戰禍而被破壞或掠奪的計集體農場約九萬八千個，國營農場一千九百個，機械拖拉機站二千九百所，馬匹七百萬頭，牛隻一千七百萬頭，羊及山羊二千七百萬頭。由此可見戰時蘇俄農業遭受損害之鉅大。

蘇俄在戰爭初期因已處於不利的境地中，故在糧食對策上，急需調整或加強其戰時農業生產，以維軍糧民食的供應，乃即建立東部地區的經濟基礎，決心進行對德長期抗戰，遂在東部各地普遍開發農業，以擴展耕地面積補填西部所受的損失。其重要措施列述如下：

○擴增耕地面積——戰時蘇俄未被德軍佔領之地區，除東部外，尚有中部伏爾加、烏拉爾、西北利亞、後哥薩斯、中央亞細亞、極東地方、北部地方等，其耕種總面積在一九四〇年約計六千二百六十萬公頃，但至開戰後第二年即一九四二年時已增至六千六百三十萬公頃，其中穀類耕種面積由一九四〇年之五千一百六十萬公頃增至一九四二年之五千三百九十萬公頃。此外，馬鈴薯與蔬菜之種植面積亦有顯著的增加。

○增加糧食產量——戰時蘇俄農業生產變化最大者，以特種作物為首。例如油脂作物與甜菜栽培，原屬南部特產，但在戰時即有計劃的向東部轉移，並普遍栽培於西北利亞及中央亞細亞等地。此外，在中央亞細亞地區，因受戰時紡織業操作時間縮短影響，原料棉花之種植日趨減產，而以穀物取而代之，使能大量增加穀物產量。並以東部地區為中心，展開糧食增產運動，以確保糧食生產之安全性。

○補救農業勞力——因受戰爭影響，蘇俄農村男子勞力大部份已應征服役，而使農業生產立刻發生勞力不足的危機。遂不得不講求緊急填補勞力的手段。其主要措施如下：

①減少春耕播種期之耕種次數，增加秋耕播種，以調節農忙季節之勞力不足。例如一九四二年之秋季作物比較一九四〇年增加百分之十八。

②大量增加農業技術婦女工作人員。例如為集體農場技術服務之拖拉機站(MTS)以及集體農場所屬技術員與指導者採

用多數婦女服務。其在各行各業工作中所佔比率已逐漸提高。如拖拉機操縱員在一九四〇年僅為百分之四，到一九四二年已增至百分之四十五。

⑧ 加強集體農場義務共同勞動。例如一九四〇年集體農民之義務日數計二百五十四個勞動日。到一九四二年已增至三百五十二個勞動日，幾乎終年勞苦，毫無休息。

⑨ 恢復收復地區的生產——一九四三年以後，俄軍開始反攻，戰局發展，日對蘇俄有利，即在收復地區內以恢復農業生產為重要任務。但因各地缺乏勞力、農具和役畜，其復興工作之進展相當困難。

(一) 戰時糧食動員——蘇俄戰時糧食動員，除前述之增產工作外，其主要措施尚有下列三項：

① 運用戰前原有儲備的糧食，控制其存量，以解救戰時糧荒。
 ② 爭取美國農業產品之援助。據統計一九四二—四四年三年間美國對俄輸出肉類、酪農製品、雞蛋及其他食糧品等約值十二億美元。

③ 對集體農場加強控制，實施穀物增產，並對整個糧食統籌運用。

(二) 戰時糧食配給——蘇俄在戰時對於民需物資，除准許一部份在自由市場買賣外，其餘則實行配給制度。有關糧食部份的情形為：

① 訂定配給基準——茲以一九四三年度中期為例列表如下：

品名	第一級 勞動者	第二級 勞動者	一般勤務者	家屬	十二歲未 滿之兒童
麵粉	1,000	800	500	400	400
肉及肉製品	1,000	1,800	1,100	300	400
油脂	600	400	300	100	300

附註：(一) 單位——公分

(二) 麵包為每日配給量，其他為每月配給量。

② 設置大眾食堂——由於勞動者及其家屬因被動員參加戰時生產後，自宅炊飯進餐之情形已較平時大為減少。乃廣泛推行社會給食運動，在各城市遍設「速簡餐廳」，以解決大眾膳食問題。

以上所述，雖然已可知道蘇俄戰時糧食動員工作，甚為積極。但自戰爭爆發以來，對於人民糧食消費已日趨降低，尤以一九四二年為甚。嗣因積極動員糧食增產與爭取美援，始漸趨好轉。例如麵粉及其他粉類在一九四〇年的供應比例為八六%，一九四二年降至七三%；肉及肉製品在一九四〇年的供應比例為四三%，一九四二年降至二三%。可見蘇俄戰時糧食之缺乏情形。

三、蘇俄戰後經濟計劃有關糧食部份推行情形

蘇俄於第二次大戰結束後，立即從一九四六年開始實施戰後階段的第一个五年計劃，亦即繼續推行第四次五年計劃。茲就有關糧食部份略述如下：

(一) 農業復員與發展——蘇俄戰後第四次五年計劃的農業發展目標在於恢復戰區農業生產設施，以補充糧食與工業原料，確保其需要。迄至一九五〇年止，其增產措施已獲初步效果，較之戰前產量增加百分之二十七。據蘇俄當局認為戰後農業增產的原因，係由於：

- ① 加強推進生產機械化。
- ② 加強施用肥料。
- ③ 改良農業技術等三點所致。

(二) 撤銷配給制度——蘇俄於大戰結束後，即下令在一九四六—四七年間將日用品配給制度全部廢除。並預定將麵包與麥粉製品之配票制度儘可能先於一九四六年撤銷。可是，當年適遭到未曾有的糧食歉收，乃不得不繼續實施。及至一九四七年因農業豐收，糧食產量較上年增加百分之五十八。始得實現前作撤銷配給制度的諾言，而恢復自由購買制度。但對糧食價格尚予嚴格管制，訂定單一的零售價格，以防操縱居奇。

(三) 糧食動員觀念與方策——由於二次大戰後，國際形勢之轉變，蘇俄為準備繼續戰爭以及所謂共產集團對民主國家進行侵略鬥爭的新形勢，仍隨時都在作動員的準備。黑魯雪夫在任時已經決定了糧食動員的方策。其基本目標如下：

① 加速農業增產——會預定在未來二十年内將農產品生產比較目前提高至一倍至二倍左右。

② 廢除草田輪種制並實行農業精耕制。

③ 重新建立農業管理機構。

④擴充農業生產設備。

這些目標能否達成？尙待證實。嗣後，蘇俄繼續實施第五、第六兩次五年計劃（一九五一—六〇年），再將計劃延長爲七年（一九五九—六五年），並將一九六五年農業總產值預定增加百分之七十，但依據近年來的情况，蘇俄所謂新的農業政策，還是失敗的。不過，它的侵略性野心，我們還要特別注意其發展。

己、法國的糧食動員制度

法國爲農業規模相當大的國家，平時糧食生產尙足自給，但到了戰時亦感糧食問題的嚴重。其實施糧食統制，爲時亦較長久。第一次大戰發生後不久，即在工商部下設國民營養處。一九一六年後將糧食署獨立。一九一七年又將籌給軍糧民食之職權劃出，設糧食局，仍隸農業部。自此之後，有專管糧食的機關。其管理制度，亦日趨嚴密。茲分述其戰時糧食動員措施如下：

一、實施糧食徵收制度，分全國爲十四管區，並負責調查及分配糧食暨與外國市場交易，以調劑糧食。

二、軍糧民食，統籌兼顧，並歸併一個機關辦理，盡力執行各項管理工作。

三、設法刺激生產，除令軍隊於農忙時酌量遣回耕種外，並增設機關研究農業生產問題，獎勵耕耘機使用，補助或貸款予農民購買機器。

四、專設農業化學處，研究增加農業化學品的生產，並向外國購入化學肥料。

五、組織難民，耕種荒廢田地，並撥貸款項，不計利息，如有損失，亦不令負責賠償。

六、限制消費。先從麵粉的保存入手，減低磨粉精度，並禁止以麵粉作麵包以外的用途。復規定麵包中摻用百分之十五至二十五的雜糧粉。

七、實施米穀專賣，國內所產及國外輸入者，均由政府統籌，並特別注意食品的運輸。

八、統制糧食價格。對麵粉公司由政府規定出售價格與農村中

各國戰時糧食動員制度的研究

實際上漲價格的差別損失，由政府予以津貼。

九、澈底統制分配，實行食糧券——憑證購買制。凡購買食料品，均須憑證定量分配，並舉辦人口消費量總登記。規定禁止出售酒類日期及飲食店的菜單，每人每日飲酒量。

以上所述六個國家在戰時所實施的糧食動員制度，雖由於各國經濟環境、政治制度與人民習慣等情形而不同，其管理範圍之廣狹與執行之嚴寬，亦未盡一致，但作爲研究對象上，實已有其代表性。容於第四章內再行提出綜合的檢討。

「本章附註」：

（一）本章關於德、日、美、英、俄等國資料，係參照行政院經濟動員計劃委員會編印之「各國經濟動員資料」第四輯「物資動員」及第十輯「蘇俄經濟動員」內有關糧食動員部份改編者。此外，亦有採取其他有關資料補充。

（二）關於法國資料，引自南京拔提書店印行孫慕迦譯「各國戰時食糧統制政策」及其他有關資料所彙列。

本刊徵稿簡約

（一）本刊園地公開，登載有關國際問題與敵情研究之專門論著與動態分析，新書簡介介紹國際間有關最新出版品為主，並歡迎海外通訊。

（二）本刊每月刊行一次，每月十日出版，二十日截稿。

（三）論著或通訊以五千字至七千字爲度，新書簡介約二千字左右，但經特約者不在此限。本刊對來稿有增刪權，作者不願增刪者，請於來稿註明。如係譯稿請附寄原文。

（四）來稿請註明作者真實姓名及詳細住址。本刊採用之稿件，一律用作者真實姓名發表，其願使用筆名者，請於來稿載明。

（五）來稿一經採用，稿酬從優，於本刊出版後致送，一稿二投者，恕不致酬。